

东阿文史资料第一辑目录

- 东阿历史概述……………文史组（1）
- 回忆东阿党的建设……………苏 民（20）
- 抗日时期的姜楼高级小学……………文史组（26）
- 我的回忆……………李长青（37）
- 卓庄惨案始末……………文史组（62）
- 我在阿东工作的回顾……………刘抗东（73）
- 宋怀良烈士生平事略……………党史办（81）
- 香山有幸埋忠骨……………民政局（84）
- 阿胶史话……………文史组（100）
- 曹植和子建墓……………文史组（122）
- 辛亥革命至文革时期东阿党政
主要人员一览……………文史组（137）

东阿历史概述

一

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之滨的东阿，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县。据考证香山遗址属仰韶文化；青塚子，王集遗址，属龙山文化。大约在公元前约七千年与四千五百年的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这里“风俗淳朴、輿情笃厚、士乐弦诵，农勤耕织”。对推动中华民族历史的前进，做出了应有贡献。

三代时（约公元前2000年），东阿禹贡，兖州之域，城设故城（今阳谷阿城），春秋战国时属齐地。秦时置郡县，东阿县名的确定，乃根据地形特点与方位而来。秦时大清河在这里东流入海，河曲形成大陵故曰阿。因阿有二，西者在赵曰西阿（即葛城），东者在齐，故曰东阿（顾祖

禹：读史方輿纪要）。《项羽本纪》载：“大破秦军东阿”，“项梁与齐救东阿”。《高祖本纪》“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汉时，东阿属兖州部东郡，三国时，曹植被封为东阿王（229年）。北齐时（550—557），谷城并入东阿，属济州部。唐（618—907）天宝元年（742年），改属济州郡；十三年改属河南道郓州东平郡。元和十四年，改天平军。宋（960—1279）时，初属京东路，永历初（1041年）置西路，改属京西路东平郡。因避水患，曾三易县城。开宝二年（969年），迁城南谷镇（今平阴旧县）；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再迁利仁镇（今平阴棘城）；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又迁新桥镇（今东阿旧城）。金时，属山东西路东平府，设镇五个：景德镇（今阳谷张秋），利仁镇（平阴棘城）、关山镇、铜城镇、阳刘镇。元时（1260—1368），改属下路总管府（司县6个），东阿为中等县。明朝时属东平府。洪武八年（1375）降州属，改属济宁府东平州辖，是年为避水患，知县宋真迁县城于谷城镇：（今平阴东

阿镇)。后几任知县，相继修建，狼溪河从城中流过，将县城分成东西两部，河上永济桥连通，壮美可观。清朝初年，属兖州府东平州。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太安州为府，改属太安府，隶山东布政使司。民国初，北洋政府时期，裁府置东临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27年）改为省治，东阿仍以县隶属，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东阿地域改变不大。大体包括今日之台前、梁山、阳谷、平阴、茌平、聊城诸县之一部分。南北长九十余里，东西宽五十五里。粮田四百七十六顷三十八亩，人口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八十二人（1932年统计）。“分疆画野，群山耸峙于东南；輓粟转漕，二水交流于西北。星映宿危之虚，界连鲁卫之交”（旧志语）。原版图，东南环山地势高，西北蕴水低而洼。现东阿县境略异于昔，约在东经 $116^{\circ}02'$ — $116^{\circ}33'$ 与北纬 $36^{\circ}07'$ — $36^{\circ}33'$ 之间，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属暖温带半滋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3.7°C ；无霜期200天。年平均雨量644.8毫米。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次年三月一日，一手策划建立了伪“满州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次年“八、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十月胜利到达陕北后，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主张。而国民党政府，却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继续进行内战。芦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而山东军阀韩复榘，却在日寇的枪声中，闻风而逃。山东人民在怒吼，东阿人民在觉醒。齐鲁故土，燃起了抗日的烽火。中国共产党人，在唤起民众，浴血奋战。

1933年，姚仲明、苏民、谭波等，在姜楼、谭庄一带，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小组。他们以学校为阵地，以教育作掩护，发展组织，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

反动派，展开了游击战争。

1938年十二月，日寇占领了县城。东阿人民，一向就有反抗侵略和压迫的优良传统。在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由于我党坚持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了全民族各阶层的力量，革命政权很快得到了发展。当时，日寇盘据县城，黄河以北设立了三个伪区政府（刘集、铜城、陈店子），到处强迫人民修炮楼，挖封锁沟。39年秋，抗日民主四区区政府在铜城成立。40年元旦，成立了东阿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由苏民任县长，受冀鲁豫边区四地委领导。

为适应对日作战需要，利于游击活动，这时期的地域区划，比较复杂。在现东阿境内旦镇一带，成立了阿东办事处（40年5月建，43年并入平阿县）；在刘集成立了实验区（41年建，43年取消改为东阿县一、二区）。原来的县城周围老一区划归平阿县；原二区（斑鸠店）划归张秋县。45年日本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进驻东阿老城，恢复原东阿县治，设区七个，耿

宗周为县长，秦延宾为书记。

1946年，国民党又疯狂进行内战，派兵向东阿县城进攻。我军为了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县城，渡河北来。十月，以黄河为界，形成国共对峙局面，县长为王宗范，县政府没固定地址，马安庄、柳林屯，都曾为县政府所在地，县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土改斗争，参军支前。村村成立了农会、模范班、儿童团等农民组织，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东阿人民，涌现了许多拥军参战模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47年10月，将东阿二区、五区划归徐翼县（县府设七级），东阿县政府正式迁来铜城。48年徐翼县、河西县撤消，原划出区域归还东阿，辖区九个，李长清任县长，始具今日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东阿划归平原省，52年撤消平原省，复归山东。58年东阿县撤消，分别并入茌平、寿张。61年又恢复原有县治，在铜城镇再立县城至今。

东阿，是一块红色老根据地。不论抗日战争

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二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武装还乡团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李子光、孙秀珍）、革命母亲（如高大娘等），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党的干部。特别有一些我党高级干部，都曾在这块土地上和人民并肩战斗过。这是东阿的光荣和骄傲。

三

东阿地处太岱之西。其山属太山山脉，多在黄河之南老县境内。河北岸新县境内则有寥寥数小山，海拔百米左右，占地六百余亩。其中有鱼山（汉武帝时称吾山）香山、艾山、凌山、曲山（即梁邱山）、位山、关山等，皆在沿河一带。老城东南则有少岱山、黄山、嵒山、云翠山等。山有名泉洞寺，古人遗迹甚多。最著名的有鱼山子建墓，黄山黄石公祠（汉张良得天书的地方），

少岱山产石如卵，摇之有声，谓之铃石。

原城之四周，峰峦重叠，溪水纵横。山山泉水，流银浮翠。洪范、白雁诸泉，汇流成狼溪河，穿城而过。夹岸柳绿桃红，村舍交错。山光水色，地灵人杰，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图。史载东阿八景有：归台遗井，黄石仙踪，鱼山闻梵，大嶷出云，狼溪春水，虎窟秋风、扈泉涌雪，洪范浮金。新县内苦山的苦羊八景有：藏春坞，邀月岩，卧羊峰，溅水塘，磨岸碑，碧虚观，瓠子沟，芦花渡。如今的东阿县城，则有七十二面琉璃井。鱼山子建墓，修葺一新，列为地区文物保护单位。雄伟的黄河大桥，虎踞于窝。位山引黄闸，控制着聊城地区水利命脉，体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东阿的河流，属于黄河水系。隋以后，运河为南北主要渠道，元朝时叫会通河。今阳谷之张秋，乃当时东阿地，谓景德镇，是水路交通枢纽，河水襟喉重地。张秋以上之黄河，经过几代王朝劳动人民的治理，至明弘治年间，黄河沿徐淮以

入海，东阿水患稍减，景德改名安平镇。旧志载：“南北孔道，水路要津。舳舻沿沂，轮蹄杂沓。人聚五音，货居百郡”。繁荣盛貌，可窥一斑。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河再次决口，漕河废，张秋乃日趋萧条。

历史上的黄河是一条害河。

考之水经，宋朝以前，黄河自阳谷入东阿，经阿城、铜城、阳刘而入长清、平阴境。今之杨柳公社所在地，乃重要渡口，唐朝及五代时（618—959），杨柳为兵家争战重地。后梁与后晋大战杨柳，决堤放水，血染水红。后梁书载：“晋袭郟州，梁使王彦章讨之。章浮河东下，以十万众攻阳杨。百道俱废，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至河津，以绝援兵”。可见当时水势之大。后周显德年间（955），河决杨柳，溢者注入梁山泊，河道后绝，南徙。宋、金、元时，黄河均走徐淮入海。明朝以后，凡河决张秋，皆由小盐河入大清河，经利津入海。

据水经所记，济汶合流成大清河，流经鱼山、

南桥（大清河上原有木桥因名、后坏），滑口，至利津入海。从张秋至鱼山段，谓小盐河。因有水时，盐舟沿此河至张秋。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于铜瓦厢，东流至张秋南，挟汶入穿运河，占小盐河，夺大清河，才有了今日之黄河河道。据史载，从咸丰五年到光绪二十年（1855—1894）三十九年间，水患严重，河决六次。“两岸居民，田畴庐舍，淤没殆尽。荡析离居，不堪其苦”。满清王朝，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率民修金堤，筑民埝。光绪二十年，民国十年，汶河入黄处，因泥沙淤积，河水泛滥，曾三次清淤挖疏。但由于贪官污吏，层层盘剥，治水钱粮，多入私囊，治河仅流于形式，河患从未排除。

今日黄河北岸之大堤，乃光绪十年（1884）创修（张秋之下堤段）。今之临黄堤，原为民埝。是沿黄劳动人民，为了耕种劳作，免受水害，自动修筑的生产堤。香山至张道口格堤，是光绪十五年筑。后把民埝连接，加固加高，随成今日之防黄要堤。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黄河又

成了八路军与日、伪、蒋斗争的天然界河，双方对峙多年。

黄河安危，事关大局。自我党在这里开展工作以来，就建立了治黄机构。领导人民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复堤，共完成土方2598万立方，石方114万立方，沿黄堤普遍加高4—5米，险工坝岸全部石化。仅东阿段国家就投资4921万元。在114里长的河岸线上，有二十七条虹吸管，灌溉土地235万亩，淤改良田2.97万亩。多少王朝没治服的黄河，被党所领导的人民征服了。黄河大堤，固若金汤。汹涌的黄河，已俯首听命，造福人民。

位山引黄闸，气势雄伟，作用重大。旱时不仅可放水灌溉本县、本地区农田，确保丰收，而且还送水到天津，解决京、津人民缺水问题。害河完全变成了利河。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能征服千年害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

四

史载：“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隋书：“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太公康叔之教，有周孔遗风”。通志云：“地近邹鲁，士知自重。勤朴深沉，恭尚风雅。以风节相高，耻为奔走冠服，居室不慕鲜华”。历代以来，名人学士，文才济济。管仲，晏婴，张良，孙臆，程昱，曹植等人，陵墓碑碣，遗迹尚在。更有仓颉墓，霸王坟，孟姜庙，子陵台，隋唐时期的程咬金，元明时期的李谦，于慎行，赵邦彦，清朝的陈宗炳等人，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在政治上，文学上都有一定的成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这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有些党的高级干部，都曾在这里战斗过，工作过。如：姚青峰、王幼平、刘致远、赵健民、谭波、谢新河、苏民、秦延宾、赵振清、李长清、段俊卿等，他们在这里领导人民和敌人

斗争的故事，至今还在人民中间流传着，脍炙人口。

还有一些党的优秀儿女，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敌人的刺刀下，刑场上，正义凛然，威武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风亮节，东阿儿女的铮铮硬骨。如李子光、孙秀珍等。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流传民间，教育着成千上万青少年。

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淳朴农民，他们不见史书，不名经传，凭着对党的信任和爱戴，为了保卫和建设这块故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黄河边上的儿女村村都有担架队员去淮海战场，家家妇女都做过拥军鞋。刘邓大军南下时，出现了不少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景。战马饮过黄河水，战刀沾过黄水磨。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演出了史无前例的壮丽史诗。

还有一些开明士绅、党外民主人士，他们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下，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曾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

作。如：唐殿安、孟继奎、黄晋三等，都曾和我党亲密共事，联络了不少民主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战争和建设，做出了不少贡献。

东阿人民，一向有反封建，反压迫的传统。历史上是农民起义活动的家乡。隋唐的瓦岗义军，明末的农民起义，清朝的捻军、黑旗军，都曾在这里和统治王朝进行过战斗。咸丰年间，捻军任柱、杨彭龄、赖文光等，都曾在铜城、刘集等地战斗过。黑旗军领袖宋景诗，于咸丰四年九月，率众数百人，自旧城村渡河而东，绕县城南去。

鸦片战争后，打开了满清闭关自守的大门。中日甲午之战，导致了戊戌变法（1898），废科举，兴学堂。辛亥革命后，文教事业又有所发展。1920年，建立了县立师范讲习所，成立了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第二小学，女子小学。各乡村亦有小学建立。在县城内也有了图书馆，通俗讲演所，民众教育馆，体育部等组织。男子剪去发辫，女子提倡放脚，官职人员去掉长袍马褂，改穿中山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姜楼小学。姜楼小学是我

党地下活动的根据地。我县第一名党员、第一个支部、第一个县委，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姚仲明、苏民、谭波、孙美亭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由于他们正确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东阿党在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却蓬勃发展。

自古以来，东阿乃兵家必争之地，再加之解放前河患多年不治，土地脊薄，交通不便，生活艰辛，“邑无千金之室”，工商业不发达。农业以豆麦五谷为主，盛产大枣。用土法熏制乌枣，外运江南，年产六百余万斤，可得洋五十余万，为过去历朝县治主要经济收入。阿胶制作，自秦朝开始，行销海内外，亦为奉献皇帝的贡品。此种珍贵药品，因产于东阿，故名阿胶。具有补血养气功能。解放前，多为个体经营，生产工具及方法落后，产量不高。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1953年，东阿药材公司，把民间熬胶艺人组织起来，建立阿胶厂，由国家正式兴办。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优质原料，再加以得天独厚的比重较大的东阿水质，荣获国家金质奖章。年产

量超十二万斤，年产值217万元。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一古老的传统珍贵医药产品，获得了新生。

东阿的妇女，解放前多从事土布生产，是农家的主要家庭副业，有商人收购外销。解放后，多自产自用，做衣制被。随着现代化生活的普及，土布生产大为减少。辛亥革命后，东阿老县城才有手工作坊，从事毛巾、缝纫、印刷，但因经营不善，常年亏损，以致倒闭。

人民政权在铜城建立后，工业才有了发展。一些比较先进的厂子，开始在县城建立。目前已有阿胶厂、农修厂、电动工具厂、造酒厂、轴承厂、木器厂、被服厂、织布厂等大小122个国营或集体企业。总产值达二千八百万元，为建国前的几百倍。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东阿受害不大。虽有传教网点，但信徒不多，声势较小，特别是党在这里开辟根据地较早，农民信党不信神。

过去，人民生活困苦时，大都闯关东。因这里离海较远，交通闭塞，华侨不多。北洋军阀时

期，招募的华工，至今流落在苏联的约有二十余人，去港台的约有二十四人，去美和去日人员，约系从台湾转去。通邮通汇者八户。他们大都留恋故土，盼望回归，具有爱国爱乡的思想情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刻在召唤着他们。祖国要统一，亲人要团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38年，日寇的铁蹄踏上了这神圣的齐鲁故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人在党的领导下，走进了“青纱帐”，抗战救国；有的人却爬进了日寇碉堡，作了民族败类，在膏药旗，东洋刀上跳舞。今天历史已作出公正的判决。

五

解放战争后期，以黄河为界划分了县域。原平阴河西部分划给东阿，原东阿河南部分，改属他县。目前东阿县面积787平方公里。可耕地74万亩。人口有368,804人。有山峦600亩，林木地12.7万亩。河流总长235.7公里。沥青面公路93.8公

里。北与茌平，齐河接壤，西与阳谷，聊城为邻，南靠台前，隔河相望梁山，东临黄河，与平阴比邻。长52.5公里，宽24.5公里。全县辖镇一个，公社13个。有600个自然村，533个大队。东距省府济南105公里，西离聊城专署32公里。全县地势海拔35米左右。

县城铜城，原为古镇。北魏时“城周8里，雉堞楼橹，居然重镇”。明朝以来，两京交通要道。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黄哲建驿，当时东阿境内有二驿：旧县驿、铜城驿。南接东平之东原驿，北接茌平之茌山驿。东阿老城——旧城——铜城之古道，民间谓之官路，即指驿马传书而言。目前，铜城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路四通八达。黄河大桥建成后，更增加了这里的繁华。每日客运56个班次，客流量600余人。往来货车，络绎不绝。

几千年的单一粮食种植改变了，东阿已成国家鲁西棉花生产基地，年产60万担。科学种田，旱浇涝排，使农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外流人员，

开始回流。

云澍低垂的山坳，流波荡漾的河畔。绿杨深处，黄河堤边。学校处处，书声琅琅。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县设师范一处，中学84处，小学480所。仅东阿县一中，解放后培养高初中学生一万二千余人，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1千余人。为了适应时代需要，教育结构正在改革。业余教育大兴，自学之风盛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代文才正在涌现。

爱国统一战线，这个党的法宝，正在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在中共东阿县委的领导下，统战部和人民政协正遵照中央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一个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越来越广泛。它调动了千千万万党内外人士，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正在使这个古老的齐鲁之乡，更加妖娆。

一九八三年四月

回忆东阿党的建设

苏 民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

一九三三年暑假，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的姚仲明同志根据省委“到农村去”的指示，带着发展党组织的任务回到东阿开辟农村工作。当时倡办姜楼高小的董事长孙广滨先生，是仲明同志的表叔，思想比较进步。他了解仲明同志是个进步的爱国青年，便邀约仲明同志到姜楼高小做临时教师。

仲明同志到校后，任我们班的国语课。他借上课之机，向我们学生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事迹以及爱国主义思想。时间一久，我们摸到了底细，了解他是个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夏末秋初，我们

几个合得来的学生找到仲明同志说，我们要参加共产党。当时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仲明同志只是说：“行，我打听打听！”

后来，仲明同志就逐渐发展了我，王玉珍、尹燕桂、刘万明等十几个人。

玉珍、燕桂和我是同班同学。一九三四年暑假毕业后，玉珍考入济南一中任党支部书记，燕桂考入济南育英中学（仲明同志回忆是华北中学）。这俩同志都是思想先进、作风正派的好同志，现都已故去。玉珍生前曾任湖北省委预备书记。

尹燕桂（又名尹涛）同志中学毕业后回到东阿工作，一九四二年间在鲁西支队任营长，那时湖西肃托波及到冀鲁豫地区。一次，去打敌人据点的行军途中，他不慎手枪走了火。当时的领导说他是有意地给敌人送情报，说他是托匪。燕桂同志自小性情暴躁，怎容得这般屈辱！一天，孙梅廷同志去看他，他告诉梅廷同志说，组织上无根据地怀疑我。当梅亭同志离开他，走出三里

多地时，听到枪响立即折了回去，可怜燕桂同志自杀身死。我们的党向来吃极左的亏。燕桂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没有牺牲在征杀敌人的战场上，却屈辱自杀身亡，应该查实平反。

刘万明同志起初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他负责联系柳林屯周围几个村庄的工作，在柳林屯、广粮门、大姜、归德铺等地发展了一部分党员、为东阿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不少贡献。

发展了第一批之后，接着又发展了邵会元、何友信（后被清除出党）、刘梦泽、曹克仁、谭学诗（又名谭魁，现在上海）、姚传贞、陶万顿（陶化流）等十几位同志。

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三三年秋建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姜楼高小党支部。支部建立后，主要由我和玉珍同志负责。主要工作是发展党组织，宣传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也搞了些反对封建迷信的活动，如组织青年学生拉倒姜楼大庙里的神像等。

姜楼高小党支部的建立主要是姚仲明同志的贡献，和创办姜楼高小的董事长孙广滨先生有间接关系。孙广滨先生毕业于济南法政学校，在老知识分子中是比较开明的。他和刘宪泗创办了姜楼高小，为穷人的子弟入学带来了很大方便。为党组织的建立，也提供了方便。由于他思想进步，积极协助我们发展党组织，后来，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孙广滨同志在东阿的革命历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姜楼高小党支部的建立，为东阿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组织在那里就象一支接力赛跑队伍，一级接一级级级都有，一直到姜楼高小停办。然而，随着学生的升学就业，一批批党员面向四面八方。他们就象一粒粒饱满的种子，每到一处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省委部分同志认为，东阿党在山东党的历史上具有典型性。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于省委内部出了叛徒，山东党组织遭受到大破坏。东阿党正是在山东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大力恢复发展党组

织的任务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为革命积蓄了力量。

二

东阿党在姜楼高小党支部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不足三年全县已发展到三十几个支部，还有二十几个个别关系，共拥有一百几十位党员。

一九三六年春天，省委赵健民同志来东阿检查工作。当时正逢我们在韩堂村西头大庙里召开有二十多个党员参加的党员活动分子会，健民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跟我一起去我家——西程铺的路上，健民同志提出，东阿应建立县委。当时，我对县委这一名词尚不理解，便问：“县委是个什么东西？建它干什么用？”健民同志说：“目前，东阿县党组织已普遍建立，建立了县委便于领导。”

根据健民同志的指示，我们在西程铺建立了中共东阿县委。县委由四人组成，组织委员刘万明；宣传委员何友信（后因其暗中加入国民党，

被清除出党），后改由秦彦宾担任；军事委员谭炳岱（后改名为谭博、新斧）；我任书记。

县委建立后，活动的基点一直是姜楼一带，县委办公地点就在姜楼高小的小楼上。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们做了大致分工，刘万明同志负责柳林屯一带工作；秦彦宾同志负责大秦一带的工作；谭炳岱同志负责谭庄一带的工作；我负责总的工作，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召集会议，联系检查工作等。

县委建立不久，当时的省委秘书景晓村来东阿巡视，告诉我们，因为省委内部出了叛徒，党组织再次遭到致命的破坏，健民、仲明同志被捕入狱，要我们加以警惕。

回忆山东党的发展，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三年中，山东党组织两次惨遭破坏，整个山东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恰恰在这三年中，东阿党组织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这就充分说明了她的典型性和特殊性。

我在东阿工作的几年里，虽为党为人民做了

一点有益的工作，但比起养育我们、勇敢保护党组织的家乡人民来，则是微不足道的。

抗日时期的姜楼高级小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三省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和侵略者及卖国贼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东阿，这块黄河之滨的神圣土地上，由于我党正确的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东阿党组织建立后，迅速获得了发展和壮大。建立了人民武装，分化瓦解了敌军，争取和利用了红枪会，战胜了日伪蒋，成立了人民政府。历史证明，姜楼高小，是东阿革命的摇篮。它在东阿革命发展史上，在血与火的抗日战争年代，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光照千秋，

激励后代。

一九三二年春，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孙广宾，法政大学毕业后，来到故乡孙庄。目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农村贫困，教育落后。深感唤起民众，教育救国的重要。当时，东阿县老城内，西城仅有一处县立高小，东城有一女子小学。全县四个区（城关、子路、姜楼、铜城），有三个区各有高小一所，唯有姜楼没学校。学生上高小，得走他乡，步行几十里。这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不堪其苦的。特别是一些贫苦农民的孩子，更无力远离家乡，外出求学。热心教育的孙广宾和姜楼知名以士刘现泗，主动和姜楼附近各乡联系，决定在姜楼建立一处高级小学。

高级小学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校舍选在姜楼碧霞宫。碧霞宫俗名奶奶庙，有大殿一座，廊房十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外有围墙。当时庙内尚有泥塑神像。孙广宾和一些学生，搬除泥胎，清扫庙堂，弄来桌凳，开学上课。县教育局每年拨款二百大洋，其他归地方自筹。招生一个班，

二年毕业，在校学生四十余人。苏民、王玉珍等，都是一级学生。

学校建立后，孙广宾、刘现泗任董事长，魏以绍任校长，司安国、孙朝梅任教员。由于各乡态度不一样，筹款较为困难，再加上成校时拉神，遭到一些遗老遗少的反对和具有迷信思想的农民的非议。魏以绍在学校办起后不久，就辞去校长职务，离开学校。董事长协商，换姜渭臣当校长。姜当时去江南卖黑枣，学校一切事宜，就落在民主人士司安国身上。司、孙二人竭力苦撑局面，认真教课，赢得了学生的好评。

一九三三年春，姜渭臣从江南回来，走马上任。这无疑是在给度日维艰的姜楼高小，注射了一支兴奋剂，全校师生，精神大振。在全县学生运动会上，姜楼高小获得了优胜，夺得了奖旗。省督学丰光荣，对姜楼高小提出了表扬。“官办不如民办，姜楼高小义务教学搞得很好”。

这年麦收时节，接省委任，司安国辞去教员，去肥城七区(石横区)，任区长。秋后，因地方集

款催不上来，学校没经费，姜渭臣又辞去校长职务，换柳林屯刘占甲（后为中共党员）为校长。

暑假期间，在济南乡师上学的姚仲明来姜楼高小，做临时代课教员。学生们，从此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

一九三三年六月，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姚仲明，在山东省委“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带着发展党组织的任务，回到了故乡——东阿韩堂。由于校董孙广宾先生是姚仲明同志的表叔，对姚仲明思想进步，年轻有为，充满爱戴和希望，所以姚一回来，孙就邀他来姜楼讲学。而姚自幼也崇敬表叔，认为他有学问，爱祖国，主持正义，能为穷人办事，是党团结发展的对象。再加上姚仲明同志这次回来，是响应省委号召，开辟农村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和发动学生而来。正需要有个合法的身分，公开的职业，活动的基地，便于安身和开展工作。所以便欣然接受邀约，去姜楼高小任课。

姚仲明到学校后担任国语课，这正符合他的

心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他利用讲台，巧妙的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讲解共产党革命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由于姜楼附近，土地瘠薄，没有巨富，在校学生，均是农民子弟，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特别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更有改变社会制度，反压迫、反剥削、均贫富、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他们拥护革命，向往革命，对党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他除去对学生进行课堂教育外，还个别谈话，提高阶级觉悟，点燃他们的革命之火。不少学生课下纷纷向他打听共产党在哪里，要求参加党的组织。姚仲明经过一段的考察，认为条件成熟，于是就在姜楼高小，建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苏民任支书。成员有王玉珍、尹燕桂、赵传耕、刘万明等十几名同志。从此，东阿人民找到了光明之路，结束了苦闷彷徨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创了东阿历史的新纪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姜楼高小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由于第一批党员的努力，又相继成立了谭庄支部、贾集支部、韩堂支部等，不到三

年时间，东阿县有三十几个支部，拥有党员一百余人。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左倾与右倾思想，还不时侵蚀着党的肌体。党内也不时出现叛徒，严重的威胁着党的安全。三年的时间，山东省委遭叛徒告密，受到两次大的破坏，而东阿党组织却蓬勃发展，方兴未艾。革命的火种，在姜楼高小播下后，随着学生的逐级毕业，逐渐扩散到全国各地。而校园内，党的发展在学生中，也象接力赛跑一样，一级级的传下去，成了革命的大本营。一九三六年赵健民受省委派遣，来东阿检查工作，参加了在韩堂大庙召开的党员会，看到出席会议的二十余名学生，感到十分高兴，对东阿充满了希望。在和苏民去他村的路上，提出了建立县委的建议。这年秋天，成立了以苏民为首的东阿县委。办公地点，就设在姜楼高小的小钟楼上。

一九三四年，山东军阀督军韩复榘去胶东视察，看到基层区政府官员，腐败奢侈，人浮于事。忽然心血来潮，再加和蒋有矛盾一怒之下，

下令全省撤区。秋天，司安国也从肥城回来，蛰居家里。刘占甲听说司回来后，即邀请他再次去姜楼高小任教。这时的教员有孟广连、孙朝梅。工友孙美亭。

一九三五年，日寇节节进逼，国民党县政府，日趋腐败，各乡乡长大多是地头蛇。只知鱼肉百姓，不知为子孙造福。对学校经费，该拿的不拿，对教职员工的生活威胁极大。但师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党的活动，在教育和影响着办学的人。他们为了学生们安全，为了学校能继续办下去，校董孙广宾认为，刘占甲不宜再做校长，于是呈文请批司安国为校长。因为司当过国民政府区长，有一层保护色，学校党的活动，不致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目，司安国怕引起别人误解，有失文人体统。借故去济南报考，离开姜楼。

几个月后，委任状下达，学校派孙美亭（已为党员）去济南，把司安国动员回来，做第四任校长。

这年夏季雨水大，学校垣墙冲毁。司安国乃一代名士，家距姜楼近，又当过一年半区长，在

姜楼周围有一定威望。因而，就任校长后，即召集各乡乡长开会，自建校以来，这是到人最齐最多的一次。顺利的达成了摊款、摊料、派人协议，很快动工整修了校舍，重建了垣墙。暑假期间，姚仲明再次到了姜楼高小。这时，党在学校中的组织更壮大了，二级学生中也有不少党员。

姚仲明在家的名字叫姚孟苓，与司安国小时共同就读于王老师，曾同窗共砚，抵足而眠，后又同毕业于县立第一高小。他们二人是同乡、同学，还有点亲戚，所以关系比较密切，感情较为融洽。司安国任校长后，姚仲明和东北大学毕业的苏德青短暂来校，除向学生传播共产主义外，并且介绍临朐县的马复生，齐东县的田耀西来校任教（均为地下党员）。暑假后，学校又扩建一班，成了两班高小。在校学生百人左右。这时的教员有魏灿亭（即魏轩，现在广东）、邵慎吾、马复生、田耀西、孙朝梅、司安国。教员月薪十五元。

当时，东阿县府设在老城（现平阴东阿镇），

教育科长是王占一（建国后被镇压），因为他反对革命运动，不关心师生疾苦，魏灿亭、孙朝梅曾联名告他，由于国民党政府官场黑暗，官官相护，老虎屁股摸不得。王恼羞成怒，下令撤了他俩的职，司安国胆小怕事，当初他们写状纸时，司虽同情支持，但没敢签名。所以王只严肃批评了一顿，要他以后严加管理，他哪知道，司已经在姚仲明、苏民等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共产主义已初步熏陶了他。只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没有冲破罗网，走向革命第一线，仅是革命的同情人、好朋友，而不是革命的同志、战士。当魏灿亭被开除时，他只是同情、怜悯、气愤，而没有能力挽回。

魏灿亭走后，孙敬溪继任教员。司安国又把以太安三中闹学潮被开除的谭波，聘来学校任初级教员兼高级小学体育课。

姜楼高小，由于党小组的建立和发展，由于党在发展的同时，执行了一条与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争取了一切有利于革

命的人，使学校越办越好。学生每星期六有一个演讲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抒发革命豪情。苏民、孙美亭等共产党人，动员学生，积极募捐帮助东北抗日联军马占山，支援抗日爱国斗争。学校里办了一个较大的图书室，由共产党员孙美亭等去济南进书。有不少马列主义红色书籍在室内陈列，对学生教育培养起了很大作用。

姜楼高小，地处老东阿县西北边陲，离县城较远，统治力量薄弱。这就给党的活动带来了有利条件。再加上党的早期活动者，注意了团结群众，及与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在人民中扎下了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所以，成了我县革命的摇篮。培养了不少人材，掩护了不少同志。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发展了党、建立了人民武装，争取了地方武装——红枪会，战胜了当时强大的敌人，引导着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很快侵入了这个地方。烽火连天，血雨腥风，学校无法上课。一些爱国师生，纷纷踏上了战斗的征程，

投身革命的洪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革命圣地延安，更加吸引着姜楼高小的学生们。不少青年，背起背包，向宝塔山走去。

学校从一九三二年开办，到一九三七年停办，共毕业学生五级，第六级差一学期没毕业。培养学生近三百人。他们现在，有的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有的转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战功赫赫，成为我党高级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姜楼高小毕业学生，师级以上干部，三十余人。曾在本地长期工作，为大家所熟悉的人中，一级学生有苏民、王玉珍、刘万明等；二级学生有赵延荣、孙朝辉等；三级学生有秦延宾、司振东、刘世文等；四级学生有孙明、刘福同、赵兰成、董传君等；五级学生有王玉山、孙毅、刘东秋等。

姜楼高小的创始人、孙广宾，后来也被我党吸收为党员。曾任校长的司安国，现为我县政协委员兼常务委员。对党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从我党的发展史上来看，

过去靠三大法宝，我们建立了党，建立了武装，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夺取政权，取得胜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历史新时期，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仍将继续发扬光大。在完成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中，发挥应有作用。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九日

我 的 回 忆

李 常 青

前 言

我是东阿县三区人。一九三七年，舍教考入山东济南中共办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后到寿张政训处。一九三八年春，南宫受训后回到东阿。从县到区，由区到县。一九四九年离开东阿，共十一年。

东阿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受

范筑先将军抗日的影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充分的发动群众，实现全面抗战，展开对敌斗争，逐渐形成冀鲁豫聊城地区，一小块有敌人无敌区的根据地之一。

东阿县的自然环境是一小块平原。西南东北长约八十华里。东西窄，宽的地方二十里、十里、窄的地方三里五里不等。南面和东面是黄河，西邻阳谷，西北靠聊城，北是茌平，东和平阴隔河相望，南面过黄河是梁山。以铜城为中心距济南二百四十华里，离聊城六十里。东阿的旧城在黄河之东，有三十余里，是处在黄河上的一小块边沿地区。

总面积约有一百二十平方华里。人口十五万。每人平均土地二亩半，共约三十七万亩。

一、阶级关系

在这块土地上，大地主只有几家。如皋上的张怀之，铜城的秦本端，殷庄的殷培符，旧城贺家，香山宋家，王小楼的姜秉怀。其余有几家小地主。如刘集的刘德超，孙郭的夏伯恒，苦山

的李广惠，还有官庄的唐殿安，陶庄的陶长义等。约计地主富农占总数的百分之五。中农和下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贫农和雇农以及少量的手工业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五。贫下中农种坏田，每年每亩产量一百余斤。生活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而且水、旱、蝗、虫多种天灾不断。有的熬硝盐也不能维持饥寒交迫的生活。受高利贷的剥削，利息轻者三分，五分，重者月课，驴打滚。劳动人民勤劳一年，上不能养父母，下不能蓄妻子，难以维持生命。有的全家，有的弃儿舍女离开自己的父母下关东。这是东阿县的阶级基础。

二、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桥梁作用

1. 组织基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东阿人民受北伐的影响，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下，政治曾一度开明，成立农会，妇会，号召妇女放足，破除迷信，拉神，利用旧庙兴办学校。因国民党的反动，政治开明虽只一现，而其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学校，如东阿的西城小学成立较早，培养出

一大批进步青年。而新成立的如铜城小学，皋上小学，尤其是姜楼小学为开明人士孙沁芳创办的，经常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如姚仲明、王玉珍、谭秉岱（新斧）等都曾任教和指导过。后来成为发展共产党的基地。

十余年中，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在这四处学校里受到反帝、反封建和爱国的教育，起到启蒙的作用。这些青年毕业后，绝大部分回到农村，有的务农，有的当小学教员。其中一部分进取心较强，求知欲高的，先后考入济南乡师，寿张乡师，聊城师范和山东一、二、三中学，受到高等教育，阅读进步书籍和马列书籍。有的觉悟很快，找到了党，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如苏长宗、姚仲明、王玉珍、魏子方、鲍兴贵、姜湘南、汪洋、秦承祐、路绍禹（戈力）孙怀清、孙怀岭二兄弟，颜华等都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前的党员。

特别是姚仲明，他在姜楼小学于一九三三年发展了苏广才（苏民）邵会元、刘万明等同志为共产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后经苏广才和陈兰

怀两同志的努力，在姜楼、孙庄、万庄、官庄、双庙、西程铺一带一二十个村庄发展了党员。还有魏子方在耿集、王西成在兴隆屯，路绍禹在大、小太平一带也都发展了党。还有从阳谷向东阿发展的党，如葫芦头、狮子宋、曹庙一带。

现在回忆，计算一下，“七·七”事变前，东阿铜城以南，将有三分之一的村子有党员或者有支部。这是东阿的抗日战争领导的核心力量，组织基础。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这一年中，东阿的党在知识青年中又有大的发展。三十年代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除秦士桂、王子敬、胡尚显等六七人参加国民党，投降日寇为民族的败类外，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进入了革命的行列，成为骨干力量。

2. 思想基础：

这一代有知识的青年，在外地受到高等教育，接受先进思想。暑假回家是同学相聚，畅谈形势，互通情况，交换思想的良好机会，也是传播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展党的有力时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听到的、学

到的有关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如“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不抵抗，未放一枪，未发一弹拱手让于日寇的卖国罪行，使东北几千万同胞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妻离子散，父母不能团聚的悲惨局面，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宣言，爱国知识青年学生向南京蒋介石请愿抗日的壮举，宣传给群众。

蒋介石继续出卖祖国，签订塘沽、何梅两个协定，丧权辱国，激起了爱国青年的“一·二九”运动，以及红军北上抗日，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胜利会师的消息宣传给群众。特别是双十二西安事变，共产党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记前仇，不计阶级私恨，主张和平解决。向群众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东阿抗日前的思想基础。

3. 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的英勇行动。

“七·七”事变日寇妄图侵占整个中国的炮声，震动着祖国的大地，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国民党的军队溃不成军、国民党的政府官员，为

自己的生命财产拚命而逃，造成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激起人民的愤恨，遭到人民的唾骂。唯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东阿县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认为同胞被辱杀，土地被抢占，再也不能忍受，急奔前线参军参战。如姜湘南、汪洋、孙怀清、宋怀良等同志在部队中先后英勇壮烈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苏长宗同志的全家被会道门杀害于河北省肥乡。

路绍禹（戈力）、田维新（田俊卿）、谭秉岱（新斧）、陈文干（陈波）、孟广乐（高伟）、孙铭（孙朝辉）、孙毅（孙朝木、抗美援朝中的特级残废）、邵学珠、耿宗周等，在部队中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个时期，身经百战，都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现仍奋不顾身地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党送赵传耕、丁英、李林、黄连普、魏轩赴延安学习深造，动员一大批青年到聊城范筑先将军的教导处受军事和政治训练，以苏民、秦彦彬、

魏子方、王西成为首，张盛斋、张少溪、杨森、史光、雷震、李常青、孙梅亭、孙朝梅、岳鹤轩（岳克寒）、陶万顿（陶化流）、孟宪业、李瑜铭、孟瑞卿、李志高、于耀三、崔杰民、颜华、李华斋等留在东阿，深入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军、建政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四一年来，党形成全县的统一领导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作了几项工作。

东阿县委是苏民、秦彦彬、魏子方、张盛斋和张少溪，除奸工作孙梅亭负责。

区委，一区书记焦书亭，二区书记刘万明、颜华，三区书记杨兰坡，四区书记雷震、史光，五区书记杨培宽。

4. 在党的领导下，武装建设和除奸。

第一、武装建设。

上级派徐翼同志来聊、阳、阿三县建立武装，成立四大队，东阿以苏民为代表参加。

东阿的民间枪支，在红枪会和万国和平道德

会两个封建迷信的反动组织之中，为地、富所掌握。但是，东阿的红枪会是在旧政府训练壮丁，每三十亩地一条枪，二十亩地一个人，不足二十亩地的拿红缨枪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就决定了红枪会人员的广泛性。党员和中农也组织进去，农村中的小知识青年也参加。这就便于我们作争取工作。

我们开始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死不作亡国奴，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实行全民抗战。这个宣传，博得了知识青年的拥护，中农的赞助，地富的同情。

同时我们的骑兵团，在东阿王小楼北边公路上，用几分钟的时间，伏击了日寇全副武装的一辆汽车，仗打得非常漂亮，给群众极大的鼓舞。现在啦起来，还赞不绝口地说：“真奥！小喇叭一次就叫鬼子见阎王去了。”

我们的七、八团也经常在东阿活动，给东阿的抗日工作极为有力的支持。

范筑先将军在聊城举起了抗日的大旗，给东

阿的人民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把范二小姐称为现在的“樊梨花”。因此东阿红枪会也一起来抗日，曾打毁一辆，打跑一辆鬼子的汽车。

这时时机已经成熟，党就号召党员带头和动员群众的枪支，成立四大队，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工作比较顺利，共动员了一二百支枪，并派孙怀岭和孙万峰两同志参加了四大队。

至于万国和平道德会的枪支，因为他们有一个反动的痴心妄想，说，日寇侵华是老百姓在劫难逃，国民党一定完蛋，共产党打天下，他们是活佛，是救世主，他们要坐天下。我们抛开他反动的一面，争取他积极的一面，教育他们和我们一起抗日。他们的头子是刘怀坡、（称活佛）。他和我们的张敬斋同志是亲戚。利用这个关系、做工作，并在其下层发展党。因此，将他的枪支，大刀拿出，由刘文义带领，号称一个连参加了四大队。

但是，地富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是反共反人民的，抗日是被迫的，软弱的。东阿县靠黄河

边的殷培符，勾结土匪刘德功，联络那一带地富，以抗日自卫团的名义，在王庙子和殷庄安设据点，切断我们河东河西的联系，威胁我们，被我们七团一举拔掉据点，将其组织击溃。

还有曹寺小地主苏丙戌的儿子苏汉章成立自卫团，被徐翼同志全歼，将苏汉章捕住枪毙。

徐翼同志带领部队将土匪张治方，刘振发拚凑起来的扰民害民的队伍打跨，教育了土匪头子董茂生，给东阿除一大害。徐翼同志的威信在群众中特别高。

我们又把有民族意识、有抗日思想的土匪头子苏虎臣教育过来，将他的人和枪组织成黄河支队归徐翼同志领导。因苏虎臣和苏民同志是一苏家，苏虎臣的儿子苏树景又是进步青年，和我们是同学，争取较容易。集合的那一天，我和于耀三同志到场祝贺。但是，不久因苏虎臣讲义气，被土匪汉奸李清江，朱振纲出卖被捕，牺牲在日寇屠刀之下。

杨立忠和我们泰西六支队司令刘海涛在东北

是把兄弟。杨立忠和土匪黄泽远又是朋友，我们利用这种关系，将黄泽远的人、枪，二、三十，由我带领送到泰西六支队刘海涛同志处。

县委自己组织了青年队，在高振銮同志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巩固了部队，后升入主力。

第二，除奸。

秦本端是东阿铜城镇的大地主。在东阿城里有商业——绸布店，是地主兼资本家。日寇侵占东阿县城，他是维持会长。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回到铜城探望，被我地下党员发觉，将信送到红庙县委，县委立即派我送信到旧东阿城东南丁泉刘海涛同志处，将秦捕去，罚款，枪毙。给汉奸地主以沉重的打击。

从此，东阿的形势一有党的统一领导，二有自己的武装，三是土匪基本消灭，四是地主，会道门的反动势力大为削弱，其组织也解体，抗日局面趋向稳定。

三、一九三九年工作向深入发展

1、县成立动委会，下设农会、妇会、青年

团、文联、儿童团，随即成立区、村组织，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抗日工作甚为活跃。

2. 政治建设：

东阿的北部有雷茂兴工作团筹建专署，并成立了四区区政府，周木舟为区长。

东阿西部运东工作团，谭秉岱（新斧）为团长，我为指导员，有宣传队和武装队。一九四〇年元旦抗日县政府成立。苏民同志为县长，秦彦彬，赵振清同志为县委书记，谭秉岱为县大队特派员，我任文教科科长。工作团的武装为县府警卫连。

县府成员，秘书孙朝梅，财科岳鹤轩，粮食科长苏振西，公安局长李健民。

区的建设，一区区长刑子厚，区队长张廷贞。二区区长魏翊濂，区队长李振洪。三区区长邵睽一。五区区长刘廷华，区队长刘九玉。

3. 县区政府成立之后，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和合理负担的经济政策，具体地实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1.5亩以下的不承担，1.5亩以上的

累进)全面抗战的主张。

为贯彻好这项政策，政府开展统战工作，聘请秦玉果、唐殿安、孟继奎、李传德、孙沁芳，甚而周林庆（后投敌任伪区长）等开明人士。向他们宣讲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大意义，请他们协助贯彻执行。因为我们是抗日民主的政策，对地富的利益损害不大，政策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他们能接受并起了不少作用。

4.开展抗日教育工作。在村党支部领导下配合群众组织协助村政权贯彻党的政策。

这项工作由文教科办，我和陶化流(陶万顿)孟宪业三个人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将在乡村的小知识青年加强训练提高认识，组织起来团结在抗日政府的周围，分配到各村任教员。我们成立一处高小，二十多处中心小学，将各村的小学划片归中心小学领导，抗日教材自己编自己印。白天教育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拦汉奸，夜晚成立夜校，教育群众，贯彻政策，拥军优属。这些乡村知识青年小学教员对抗日思想和八路军抗日的

胜利消息起了传播的作用，对政策的贯彻起了桥梁作用，对组织群众起来抗日起了协助作用。

5. 破路对敌人展开交通战。

我区是平原，敌人是现代化机械武装，行动快。我们挖战沟叫抗日沟，便于我们周旋迂回，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扫荡时便于群众隐蔽转移。

这个时期，全县有党的统一领导，党发展的较普遍，约百分之九十的村有支部，有了自己的武装——县大队、区队。有政权和正确的政策实行统战。一能团结地富，二使群众认识到抗战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一致的，更能起来抗战和支援抗战。抗日形势形成高潮。

四、对敌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1.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敌人采取蚕食和碉堡政策。

大地主刘德超投敌在苦山安了炮楼，在广粮门设了据点，建立伪三区区部，形势开始恶化。土匪再起，伪军猖獗，打死我三区区长邵睽一，打死地委干部李甦，社会秩序又出现混乱，群众陷

于恐慌之中，党派我协助孙焕周到三区坚持工作稳定局面。

2. 我党为了长期抗战，也做了些准备工作。我记得苏民同志常讲，我们学孙悟空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开展工作。

派李振元，徐衍祥到刘德超处作长期埋伏、作内线工作并搞情报。

选择了些适当人物去作敌伪政权工作，如派刘美冉为伪三区区长，李茂勤为效忠乡乡长，宣化乡，大有乡乡长也为我们掌握。又如派雷保湘到铜城据点底下当新民会会长暗作情报工作。

争取一些伪乡长为两面政权，如良知乡姜立正。

3. 敌人的野心很大，进一步实行囚笼政策，在东阿一百二十平方华里的地面上，先后建立了三个大据点——广粮门、铜城、牛角店，住有鬼子和治安军，共立了二十多处炮楼，每个炮楼有伪军，少者几十，多者百余。平均每五六平方里就有一座炮楼。群众说从这个炮楼就能看到那个炮楼。

又挖两条宽二十米，深十米的大封锁沟，修了一条从阳谷到牛角店的公路。把这个地区划成四小块。四区区长周木舟逃往外地；二区区长魏翊濂隐蔽不出，区队解体；一区区队长张廷贞带队投敌；五区区长刘廷华区队长刘九玉带武装到敌人那里去了；县府秘书郎笑山投敌；民政科长于仄民、民政科员田兆庆投敌；粮食科长苏振西投敌；胜利报社编辑周庆印投敌；五区区委书记杨培宽，一区区委委员杨之序投敌。形势恶化到了极点。

4. 我党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活动。

上级派来谷泉同志为县长，李华光为秘书。还调来李健民、韩雁北、李杰三、谭锡三、谭洪州、孙化三、董毅民、张青、王智、孙岳东等同志支援。

党和政府化整为零。

加强基层。

派谭锡三到一区加强领导，派赵爽到二区，李杰三到三区，王中范到四区，我到五区，依靠党和群众，组织区队和民兵打击敌人。

县政府带县大队，武工队机动灵活地乘机打击敌人教育伪军。

县委成立敌工部，韩雁北、史光同志领导配合梁仁魁同志做伪军和情报工作。

5. 敌人进行强化治安，在据点和炮楼中设有特务，村设联络员，向敌人报告我八路军和干部活动情况，迫使我们完全处于地下，白天潜伏夜间活动。我们遭受一些损失，如三区队住在曹寺被敌人联络员告密，将三区队打死四人，捕去一些人，全队覆没。如小学教员刘占申和农会主任孟广信被捕送到东北千金寨劳动，赵庄支部书记赵德增和小学教员迟云厚被敌捕去至今下落不明。在敌人面前也出现了一些英雄人物。如官庄一区农会主任刘殿阶在叛徒对证下，洋狗咬、毒刑拷打，折磨得死去活来誓死不屈。五区助理员李子光誓死不披汉奸皮，大骂汉奸走狗刘绪安，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慷慨就义。

6. 进行反特斗争。

张醒民同志带领武工队在铜城鬼子据点底下

打死死心踏地的特务队长孟广富。

县大队队副王子奎打死铜城鬼子据点附近的汉奸秦士盈。

韩雁北同志带武工队和内线李振元、徐衍祥同志，紧密配合截击领着鬼子扫荡的周庆印，将周庆印当场击毙。

发挥内线作用。在敌人的内部制造散布假情况，施离间计叫鬼子把张廷贞枪毙。给敌人震动很大，人心大快，敌特丧胆。

还有三区中杨庄在区委书记杨澜坡和支书杨广庆的侦察下，协助县武装枪毙了向群众要钱要枪的房羽成、汉奸特务杨广文和杨占元、王常利，特别是除掉了向敌人报告十八名共产党员的地主反共分子杨中荣。保护了党，安定了这一带村庄的革命情绪。县府枪毙了杨之序和田兆庆，争取了杨培宽，行署枪毙了郎笑山。

对伪军进行教育。争取、分化瓦解。

各村支部教育敌伪联络员和派联络员向敌伪做假报告。我们走后报告。小部队说是大部队，大

部队说成是小部队，迷惑敌人并向我们报告敌情。

在敌人内部（苦山据点内）由李振元和徐衍祥设计打死汉奸国民党员张仙洲。

县府对抢掠群众财物，不听指挥的伪队长刘纯笃和刘得意逮捕法办。

在我们抗战重大胜利的影响下，如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说明了八路军不是好惹的。我们的地方武装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以军分区独立三团以及县大队为后盾，李振元、徐衍祥在敌伪内部以拜把兄弟的形式感情拉拢争取了伪军队长曹洪文、尹得月，赵二虎以及宋广林。还有刘德超的秘书长张慎五，掌握了全部伪军的花名册。

在“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下，开展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育，并建立黑红功过簿，做一件好事记一红点，做一坏事记一黑点，在分化伪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各区领导村支部和政权做各伪军的家属工作。说明当汉奸可耻，遗臭子孙后代，抗日战争快胜利，叫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留出路，

不做坏事，戴罪立功。有好些村无当伪军的。如官庄，全村有三四百户人家，无一人当伪军；张半仙也无一当伪军的。因此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回据点和炮楼中去。不仅一般伪军给我们拉关系，就是东阿城里的剿共班高学言也给我们建立关系，送情报，掩护我们的干部。

7. 扫荡和反扫荡。

敌人依靠他们的乌龟壳实行铁壁合围，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一九四三年春节大扫荡赶面式的从南到北，连群众过节吃的饺子，窝窝头都抢了去，在锅里拉上屎。一方面群众遭受损失，一方面激起群众的愤怒。对大扫荡我们敌情工作做得比较好。我们领导群众藏粮，坚壁清野。大部队跳到外线，区村武装实行隐蔽和群众一起跑扫荡，同时监视炮楼和村中的敌特活动情况，扫荡过去后和敌人清算。对小股伪军出来抢粮，我们组织民兵联防打退敌人的骚扰。如官庄在党员刘洪林和王广修的领导下，打退两次敌人的进犯。第三次众寡悬殊，有计划地撤退。又如双庙

在党员王万田、王万德的领导下打退数次敌人的进攻。这个村始终是我们军分区、三团、县府的坚定不移的大后方。有时安置伤病员八十多人。我们的情报站，交通站设在这里，由王法孔同志负责。一九四三年环境正当恶化的时候，张霖之同志在此村住过一两个月。

群众不给敌人送东西，敌伪夜间出来抓群众要粮要人，我们实行联防支援各村。如我在姜韩庄和敌人遭遇战斗打响，县大队队副王子奎带队及时援助将敌击溃。不幸的是通讯员王继太和干部赵世良被捕落到日本国，日本投降后才遣返回来。

8.群众同我们干部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不怕危险，掩护我们。

如红庙是抗日战争中很好的村子，县委委员常住在后街张盛斋同志家，抗联干部常住在前街学通和玉珍家。敌人曾包围搜剿过几次，干部都被群众巧妙地掩护下，未受任何损失。当时的县委书记赵振清同志现在回忆说，如不是红庙的党和

群众，我们早已粉身碎骨啦。

又如，一次我和三区区长李杰三同志夜晚住到曹寺周庆武家。天刚亮，日本鬼子和伪军包围了这个村。而周庆武挺身出门迎敌，被敌人打了两巴掌，问他：“昨晚住到你家的两个干部哪里去了。”而周庆武机警地说：“来了，昨晚坐了会就走啦。”缓冲一下敌人来进院，随后将我们藏在夹壁墙内，幸免大难。

还有张半仙村长张清海，干部住在此村，自己亲自背着枪给干部巡逻放哨，使干部安心休息。

有好多堡垒户挖地洞，在敌人的扫荡和情况紧急时，把干部藏起来。

特别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郭万庄的高大爷、高大娘（高建荣、藏爱民）二位老人：

①爱护干部胜亲人。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给干部吃，给干部留着吃。干部不分大小一样热情照顾。

②有危险他去担。他们的村离炮楼二三里地远，在敌人扫荡时他掩护干部、收放文件，出去

了解敌情，使干部能够转移就转移，不能转移就藏起来。我们的专员有病住在他家一二十天。

③不怕威胁。汉奸威胁恐吓他，巧妙地顶回去。

④革命的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几十年如一日。现年九十一岁还是怀念干部，忧国忧民。因此都尊称他大爷大娘。

五、革命力量大发展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党提出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形势稍趋缓和。我们抓紧进行土地回赎增加工资，进一步发动群众，发展党，扩大武装。出现了不少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的事迹。如曹庙景泗同志年逾半百，自己刮胡子带头参军，并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送去参军。还有张半仙全村没有一个适龄青年不当兵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东阿伪军有十五个中队，一千余人宣布起义成立军分区和独立支队，梁仁魁为支队长，韩雁北为副支队长，李振元，徐衍

祥参加，开赴前线。从此胜利的曙光已照耀在东阿这块土地上。

结 束 语

我回忆起当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敌处优势，我处劣势（指武装力量），在敌人烧杀抢掠，到处搜捕我抗日干部的情况下，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决顽强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深入普遍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运用和发挥党的三大法宝的威力。敌人侵占我们反侵占，敌人烧杀抢掠我们反烧杀抢掠，敌人实行特务活动我们反特务，敌人公开我们隐蔽，以中华民族的气节教育伪军，分化瓦解以至争取他们。这样我们的力量逐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劣势变为优势。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流尽了鲜血，有多少同志和战友被敌人杀害，有多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和迫害，有多少人丧失了自己的亲人，换来了有敌人无敌区的局面，最后战胜敌人，消灭

敌人，获得革命胜利。现在我们回想起无私的先烈和受迫害的同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引起深深的怀念，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前进；对不顾自己危险舍生忘死掩护过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我们终生难忘您高尚的品德，永远感谢您，用工作成绩来报答您。

卓庄惨案始末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后，鲁西北局面，暂时呈现混乱，人心惶惶盗贼遍起。为了稳定局面，安定民心，我党及时举出八路军军旗。于是，成立了八路军先遣纵队。一二九师师长为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任命李聚奎为纵队司令员，王幼平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先遣纵队包括武装力量有：津浦支队、青年纵队、一二九师骑兵团。一九三九年九月，部队得到扩大，并入卫河支队，成立了第五大队。许清同志任大队副，活动在茌博一带，大约有三百人。后

来，部队改编，调任新编第三团副团长。为了开展地方工作，进行游击战争，为大部队培养兵源，许清同志由三团转到地方，来茌、博、聊、阿游击区任副大队长兼政委，负责部队训练和政治工作。

茌博聊阿游击队，是在地方民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人民武装，原属先遣纵队。为适应抗日形势需要，改编成游击队，和区支队并肩战斗在四县边沿地区。约有一百五十人，队长为朱文正。

朱文正同志，一九〇二年一月出生在茌平韩集公社石海子村。一九三八年二月入党，一九三九年五月逝世于东阿周庄。后由其儿子朱英明同志接任大队长兼区长。

许清同志是江西吉安人，一九一二年生人。一九三三年入党，曾为周总理警卫员。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从延安来我地区，原任先遣纵队三团副团长，后任游击大队副队长兼政委。为人正直，说话有些蛮。群众和战士曾爱戴的称他为

“蛮子队长”。

许清同志具有老红军的优良品质。治军严谨，关心群众。他来游击大队后，严格按红军传统办事。整顿军纪，忙于操练，认真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苦。常深入民间，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且在部队里成立了民运小组。每到队伍驻防转移后，就留下民运小组清理善后，打扫卫生，归还借用的物品。如有损失，按价赔赏。这种秋毫无犯的军风，与当地土匪组织及石友三“刮民军”，抢劫民财，骚扰百姓，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深受群众拥护。队伍迅速扩大，不少青年纷纷入伍。在军威大震，蓬勃发展时，有的绿林武装也拥护抗日，加入游击大队。如秦成良等。

驻扎在这一带的国民党，日伪汉奸和地方顽固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八路军。对游击大队极端不满，时刻想消灭它。这里的农村，当时有一种迷信武装群众组织——红枪会，是由聊城传入，总头子是聊城花牛陈的陈万泗、陈玉怀，他

们和荏平红枪会头子季怀义结合在一起，为国民党效劳。用迷信煽惑群众，和八路军作对。他们用保卫地方治安，防匪防盗的招牌，拉农民入会。受蒙蔽的群众，在反动派的唆使下，做了一些破坏革命的坏事。震动鲁西的卓庄惨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一九四〇年一月，我行署军分区司令部，住在迟桥、大白庄。肖华支队住在四王集、解白刘一带。敌伪顽把这块抗日根据地，称谓“匪区”和“匪穴”，伺机进而犯之。春节前不久，在博聊阿游击队，由许清同志率领，午夜行至卓庄宿营。大队长兼区长的朱英明，留在区部准备部队过节的东西。我军行动消息，被敌人获悉，次日黎明，纠集反动势力两千余人，向卓庄扑来。为主的是陈玉怀、季怀义的红枪会。国民党和日伪武装，荷枪实弹，混在红枪会这支反动迷信的群众组织中，杀气腾腾，包围了卓庄。

隆冬的原野，没有任何屏障，一望千里。当时的卓庄，有个土围子，四面有门。哨兵发现敌

情后，报告了大队副，但许清同志没有下令转移，认为红枪会是民众组织，没有现代化武器。我有围墙掩护，居高临下，大刀长矛，不能加害于我。我们游击队是抗日武装，人民子弟兵，和群众是鱼水关系。只要向群众讲清道理，红枪会是不会伤害我们的，他想用八路军的政治攻势教育群众，团结人民，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共同抗日，拯救中华。

等到红枪会涌到卓庄村边，许清站在围子墙上向群众喊话：“乡亲们，我是许蛮子。我们的军队是抗日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咱们是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正在这时，隐藏在红枪会人流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汉奸的枪炮响了。红枪会中的反动头子和受毒较深的会员，水泄不通的团团把卓庄围了起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冲击。许清这才恍然大悟，要撤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命令全体队员，迎战顽敌。在这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敌人开始进攻了。我游击队战士在许清率领下，展开了巷战。经过激烈的肉搏

战，许清同志，身中数刀，壮烈殉难。

这支革命的队伍，共有三个中队一百一十余人。除去两个班去别村催给养、两个班去耿集买菜外，其余大部牺牲。偶或红枪会中有熟人的，生逃寥寥无几。

在这个游击队里，还有从三十里铺来的十几个宣传队员，他们的年龄都在十五岁以下。就是这些儿童，也没逃出浩劫。有个红枪会头子李泽林，一手提着一个年龄小的战士，高喊“六亲不认”，拉到西门外场里，用大刀活活劈死。

这批野蛮的红枪会，杀害我革命战士的手段，是极端残忍的。有的砍头，有的剖腹，有的剃为肉浆，有的用枪头子刺穿、挑死。

在敌人的残杀下，卓庄人民，始终和党站在一起。他们冒着杀头危险，勇敢的掩护了我游击队员。这次惨案的幸存者，现任荏平三十里铺南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和贫代主任的杜振江、沈五庚，就是卓庄东门里卓宾亭一家用生命掩护下来的。

红枪会杀进卓庄后，就晓谕全村，谁家若是

窝藏游击队员，满门抄斩。许清同志牺牲后，十四岁的杜振江和十三岁的沈五庚手无寸铁，被敌人提刀追赶，岌岌可危。他们先后来到了卓宾亭家。卓老太太立即把两个孩子拉到北屋，交给儿媳宋氏。装做他的儿子和外甥。上炕坐在她身边。这时共有三个孩子坐在炕上（其中有宾亭子竹贞，十一岁）。红枪会提刀持枪来搜查过十几次，都被她们巧妙的掩护过去了。最后一个凶残的家伙，不相信她家有三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把刀放在脖子上威胁，她临危不惧，镇静的做了回答。说是沈五庚是她外甥，家是大王，他爷爷叫王传远。这才使他俩保住了性命。

晌午歪，敌人走了。卓庄陷入了可怕的寂静。卓老太太到街上看了看没人，宋氏赶紧找了个打狗棍和破篮，让他俩装扮成乞丐，出东门沿封锁沟往北而去，到王集附近，遇到了肖华支队侦察员，他们报告了卓庄情况。不一会骑兵就直奔卓庄、贺庄去追击敌人。

这次惨案，在卓庄西头敌人用大刀砍了二十

七人，到贺庄西又砍了八个。巷战中牺牲了二十多。直到现在，卓庄西头围子沟里，还埋着烈士的累累白骨。这是反动的红枪会，屠杀抗日军民，欠下人民的一笔血债。

卓庄惨案发生后，敌人气焰甚嚣尘上。他们进行更加毒辣的清乡活动。陈玉怀、季怀义带领红枪会，向我抗日根据地逐村推进，步步为营。走一村吃一村，如归顺他们，就拔营前进，再去征服另一村。如不服，就进行烧杀抢掠，坐吃骚扰。迟桥群众不服，他们就放火烧了村子。逼的群众无家可归，受害极大。

这支残忍的红枪会成员，大都为西候村及赵牛河以南七村（辛庄、苏庄、王楼、邢庄、宋庄、石庄、吕河头）的土豪劣绅及受蒙蔽的群众。

我抗日军民忍无可忍，纷纷要求出击，为许清同志报仇，为卓庄死难烈士报仇，消灭进犯根据地的反动派。我党及时总结了教训，认为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只有用武装打下敌人的反动气焰，才能争取群众，

教育群众，保住根据地。

一九四〇四月五日，趁三月三古会之机，肖华支队奉上级命令，派八团和军区司令部联合去消灭陈玉怀这支反动的红枪会，惩罚制造卓庄惨案的刽子手。

战斗打响后，反动红枪会头子姜玉芝，带领两个徒弟，光着膀子，念着咒语，手执大刀和铁杆红缨枪前冲。被我战士用机枪打死。红枪会中所谓刀枪不入的神话破产了，有些会员开始觉悟，纷纷投降，改邪归正。

这次战斗，由于战士的愤怒，消灭红枪会反动分子二百余人。这一来，大大煞了敌人气焰，保住了根据地军民。

正义惩罚以后，我党根据统战政策，及时作了安抚工作，除去惩办首恶分子外，其余不究。参与卓庄惨案，杀我战士的，只要真正悔改，不算老账。有不少红枪会员，纷纷向我悔罪，弃暗投明。战斗中毁坏的房屋，我政府及时予以重建。对死者家属，进行教育和安抚。血的事实教育了

群众，过去受蒙蔽的群众，逐渐觉悟，转变立场，加入我党领导的抗日行列。赵牛河以南七村，本是红枪会的基地，大部参与制造了卓庄惨案。也在我党领导下，成立了军民联防。不少人退出红枪会，参加了民兵和自卫队。原红枪会小头目张庆华，转变立场后，还当了我抗日军民联防队长。这一带村庄，后来在形势一再恶化时，也没有叛变投敌，而坚定的站在了人民一边，成了我们的可靠根据地。

卓庄惨案后，为了纪念许清同志，把他的遗体从敌人碉堡群中，迁葬当时我们的根据地东王集西头庙旁。一九四〇年四月，在董建英区长提议下，先遣纵队三团，给他立了石碑。以悼念这位人民的英雄。

在长期的艰苦岁月里，王集人民，为了保卫这块墓碑，费尽了心机。后任区长朱英明，当时的伪乡长我方地下工作者许风玉同志等，曾冒生命危险，巧斗日本队长李井，保住了这块丰碑。王集支部和群众，王兴平、王兴桂等，也出了不

少力。

碑文为基干一团刘光启同志写。原籍平阴，当时移居王集的石匠刘保同刀刻。

墓碑的正面右上方写着：

杀日寇打顽固英勇牺牲流尽鲜血
经长征过草地艰苦奋斗伟姿宛在
中间写着：

革命先烈许清同志墓

左下方写着：

八路先遣三团全体指战员

一九四〇年四月敬立

在许清墓旁，至今还有七个烈士墓。

卓庄惨案已经过去四十四年，先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已经到来。特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正在勤劳致富的路上迅跑，这是堪以告慰许清同志于九泉之下的。

卓庄惨案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八四年五月十五日整理

附 言

本文系根据朱英明、许风玉、杜振江、沈五庚、卓宋氏、卓竹贞、王兴平等同志回忆材料整理而成。

我在阿东工作的回顾

刘 抗 东

一九四〇年四月，我在鲁西区党委党校学习结束后，回到四地委（运东地委）。军分区，专员公署均已成立，和地委一起驻在东阿县铜城附近宋楼一带。正值开展“红五月”的抗日动员活动，以茌平、东阿交界地区为中心的运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军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抗日的声浪越过原野，传遍各个乡村。

组织决定我去新成立的阿东办事处工作。由

专员夏振秋，民政科长王维，召集我和东阿县县长苏民一起谈工作。办事处受专署和东阿县的双重领导，苏民兼主任。一九四〇年五月我去阿东工作，直到一九四四年五月我去太行平原分局党校学习，在阿东地区整整工作了四个年头。现将阿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党、政、军的建设发展概述于下。

一、行政区划及其变革：阿东开始只辖原平阴的四（牛角店）、五（亘镇）两区，因平阴县境为黄河横断，大部地区在河南，只有两个区在河北。受自然条件和敌人分割封锁的限制，为便于领导，河北部分成立阿东办事处归四地委领导，河南平阴县为一地委（泰安地委）领导，在此以前这个地区成立过肥（肥城）、阴（平阴）、阿（东阿）办事处。一九三九年，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的五支队（司令曾国华）从冀鲁边区开到这带活动，建立了这个地方政权。一九四〇年夏，该支队奉调鲁西南濮、范、观一带讨伐叛军石友三，这个办事处也随之撤销，阿东办事处是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原肥、阴、阿办事处主任赵达还向我做过移交工作。阿东办事处成立时的一些人员，也多是原肥、阴、阿办事处转过来的。

一九四〇年秋，由于形势变化，阿东办事处就和东阿县分开，并将东阿原四区（铜城）划归阿东管辖，成为直属专署领导的县级政权。我为主任，张武云为付主任，田绍振为秘书，并将区名重新作了调整。原东阿四区改为一区，区长为雷明三，后改任为齐禹，原平阴四区改为二区，区长张峰（形势恶化，外逃经商），后换刘承泗，五区改为三区，区长田文。办事处机关陆续建立，民政科长尹廷序（一九四二年春大侯庄战斗被捕牺牲于平阴），财政科长黄冠儒，文教科付秀峰，粮食科长朱玉成，公安局长赵忠民，武装科还未任命科长，

一九四三年春，专署派原秘书主任邢凯风任阿东办事处主任，我为付主任，以后，一、四专署合并为冀鲁豫大专署。一九四三年秋，阿东办事处与平阴县合并成为平阴县，邢凯风为县长，我调县委任敌工部半。

二、党的组织领导：开始设中共阿东工作委员会（等于县委）。第一任书记为石大观，后为肖鸣，组织部长孙泽生，宣传部长孟岳山，民运部长李健兼抗联主任。下设三个区委会。改为平阿县后，县委书记为朱明山，副书记为肖鸣。

三、武装建设：办事处开始只有少数武装警卫通讯人员，逐渐扩大为警卫排，警卫连。连长为田文，指导员为关超（大候庄战斗被捕），以后按军分区规定的各县武装建制序列，扩建为独立六营，我兼营长，张强为副营长。后又改为五大队，张强、王月亭先后任大队长，新斧，张成功先后任副政委，各区均有区队。此外，公安局还有武工队，镇压汉奸，侦察敌情，收集情报，也配合部队作战。

四、敌我斗争形势：我刚去阿东时，当地形势也和运东抗日中心区一样，也是形势大好，由于五支队在那一带活动，帮助地方开展工作，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农会，妇女会，自卫队、儿童团，各村普遍建立，并将道路挖成抗日沟，改造地形，坚持平原抗战。自卫队、儿童团手持大

刀、长矛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须有路条才能放行。到处呈现出抗日根据地的新气象，新秩序。到六、七月间，日伪乘我军主力转移讨叛之际，河南的敌人开始向北进犯，在陈店子安了据点，接着在牛角店、旦镇也安设据点。与此同时，李子干庄的反动红枪会发生暴乱，二区的王楼，围子董的红枪会也相继而起，将我军伤员和寄存的枪支物资送交敌人。在此严重的局势下，由军分区刘致远司令员主持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中分析了情况和发展趋势，决定给予军事打击，把打击重点放在红枪会上，如不立即扑灭任其到处蔓延，对我们威胁很大。当夜即以军分区主力部队打击王楼的红枪会，以长清独立营（那时归四军分区指挥）打击旦镇伪军。经此战后，将红枪会全部扑灭，稳住了局势。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碉堡囚笼政策，大肆安设据点。一区的铜城、杨柳、井绳赵；二区的湖溪渡、黄圈、邵瓜赵；三区的董庄、大辛庄等相继安设据点。在据

点与据点之间又挖了纵横交错的封锁沟，将我根据地分割成小碎块，再配合扫荡与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我抗日力量。还在一九四一年盘据在平境内的顽军齐子修的三支队，就向东进犯，与阿东的敌伪军勾结配合对我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支队的冯太恒，就在在阿交界的刘王山安了据点。这就形成我与敌伪顽复杂艰巨的斗争局面，也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

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鱼水情般的团结，发扬不怕艰苦牺牲英勇战斗的精神，执行了对敌斗争的正确方针与策略。如精兵简政，缩小非战斗机关，组织小部队和武工队插入敌后活动，使敌首尾不能相顾。采取隐蔽斗争方式，派人打入敌人的内部，例如派党员陈家修打入牛店伪区部，李敬民打入冯太恒部，让生业礼当牛店伪区长，进行策反和情报工作。对伪军是打击最反动的，争取一般的。如刘绪安伪军中，对最反动的刘传兴中队，当它与其他伪中队同时住在旦镇时，我们就单独对他的队部进行袭击，对刘传

印的伪中队就进行争取。如在曹庄伏击战中缴获刘传印部的枪支又行退还。还在伪军中散发鲁西军区制定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传单，分化瓦解敌人，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及一切可以利用的抗日力量（如利用高集对敌我都有关系的两面人物孙文宗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抗战最紧张阶段，让他把鲁西妇救会主任郭军、万丹如，刘致远司令员的爱人宋伟，苏民以前的爱人王金等女同志隐蔽起来），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终于战胜敌人，渡过了难关。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寇兵力部分外调，代之以伪治安军。敌人愈战愈弱，我军则越战越强，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军便开始反攻，拔除敌人据点，两年打败德国，三年打败日本的胜利曙光已经在望。到一九四四年春，平阿县河北境内，只剩下湖溪渡、牛角店两个孤立据点。四、五月间，我军分区部队一举拔除了这两个据点，原阿东境内已无敌踪。

攻打牛店据点，内线工作是由我向生业礼布

置的。原定我军进攻时间为夜间十一点，生业礼便将伪军头目请到伪区部吸食鸦片烟，以便我军进攻时，使伪军失掉指挥。因我军进攻时间推迟到深夜一时，伪军头目返回队部，加以我军攀登据点的云梯正在战士爬登时刻折断，惊动了敌人，便展开激战，敌人居高临下，我军密集在据点附近，伤亡较大。担任主攻任务的基干二团政委王克寇也牺牲了。我和克寇同志，即是同乡，又是同学。在进攻牛角店进军途中，我俩边走边谈。他曾对我说，“今天晚上，要是我死了，你把我送回家去，要是你死了，我把你送回家去”。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献身的豪言壮语呀！每一念及，不禁感慨系之。

在我一九四〇年去阿东时，那里还无敌影，当我一九四四年离开时，原阿东境内又已无敌踪，但其间经过漫长时间的艰苦战斗，牺牲了许多革命同志，才从敌人手中夺回我们的旧山河。用下面几句话作为我写这份材料的结束语，“来时无敌影，去时无敌踪，光复旧山河，牺牲众英雄。”

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在党的十二大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同第三世界的国家人民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奴役，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十亿人民的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我写这份材料，不过是阿东地区雄伟壮阔的抗战局面的一些片断，也会有不确切之处，有待于其他同志提供的材料加以补充更正。

宋怀良烈士生平事略

宋怀良同志，又名宋若愚，字善庭。东阿县铜城镇宋楼村人。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一九四一年一月牺牲于皖南茂林地区。

宋怀良同志自幼上学，一九三〇年在铜城高小毕业后，考上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他目睹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劳苦大众受欺压，极为不满，对改变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具有迫切要求。为了寻

求革命的真理，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的书刊，结识了不少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在济南一中读书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宋怀良同志面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自动让出东北三省的卖国行为，更是满腔愤怒。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济南学生在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南下请愿团的影响推动下，也纷纷起来，组织南下请愿团。宋怀良同志作为省立一中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南下请愿，同国民党政府作了面对面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宋怀良同志在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三六年，宋怀良同志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临清黎博寨乡农学校（有的说分配到聊城梁水镇乡农学校）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弃职回家住了半年。当时，其父宋子明（民主人士，曾任省政协委员，齐河县副县长，一九七一年病故）在范专员部下任八大处的处长。经其父介绍，到

聊城范专员部当粮食科科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范专员阵亡，宋怀良同志随王金祥到了朝城。到朝城后，怀良同志逐步了解到聊城失守的真象，识破了王金祥的真面目。三九年农历正月末二月初，怀良同志同田维新、李士钊等同志，一行八人骑自行车奔赴陕北。路途中，随行随卖自行车作为盘缠，最后到达陕北时，自行车、棉衣皆已卖光。到陕北后，宋怀良同志被分到抗大二分校政治队任队长（当时抗大分校校长何长工）。

抗大毕业后，宋怀良同志被分配到安徽省铜阳县新四军某部任独立营营长，后晋升为新四军×师师长。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派一意孤行，策动了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凶相毕露，发布了要“八路军、新四军放弃原有阵地，限期北移”的反动命令。为了顾全大局，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争取国民党一同抗日，我党决定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北移。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到达茂林

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地形不利、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宋怀良同志率其部突出重围，准备继续北移，但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根据当时的战情，部队集体突围已无希望，宋怀良同志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散突围。虽有少数战士突出重围，但宋怀良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当时他年仅二十九岁。

香山有幸埋忠骨

在黄河的西岸，东阿县城的东南方向有一座小山，名曰香山。在它的北边不远的地方有几株苍劲挺拔的松柏，这里安葬着东阿县的一位忠烈——李子光同志。

年年清明节前后，前来为忠烈祭扫的人群络绎不绝。在这里举行祭扫仪式，聆听先烈的革命事迹，庄严地向烈士宣誓：子光同志安息吧！滔滔黄河为你歌唱，巍巍群山为你站岗，你为革命虽已与世长辞，却死而犹生。我们年轻一代一定

要发扬你的革命精神，继承你未完成的事业，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

李子光同志原名李怀明，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山东省东阿县王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弟兄三人，排行老二，由于子光同志自幼生得聪明，全家人节衣缩食，供他上了几年学。但是民国初年，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他家连最低生活也难以维持了，年幼的子光同志不得不中途辍学。

子光同志在校读书虽只有几年，但却为他的自学打下了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本村就成了一个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了。在附近几个村庄也有了名气。随后在本村的村公所里当了几年管帐先生。也就是在这段生活中，使他认识到了旧社会官场里的腐朽。一九三三年底辞去了这个所谓的“大先生”。

一九四三年春，到离家不远的孙道口村当了小学教师。他希望在新的职业中培养出一代新人改变旧社会的现实。他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

处处为学生着想。对学习上吃力的同学他就具体辅导，对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他就尽自己的可能出资相助。所以他教书的时间虽不算太长，在他的辛勤教诲之下，有不少的同学却很有长进。后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相继参加了革命。

但是，芦沟桥“七·七事变”的炮声，使他这种美好的愿望破灭了。日寇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败退，大片国土被侵占，无数人民被蹂躏，土地荒芜，工人失业、学生失学，到处呼天唤地，要求抗日救国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切的一切，使得年轻的忧国忧民的李子光同志，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社会的现实告诉他：非另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不可。

就在这时，子光同志和一个以阜学校卖文具为名的地下工作者——张殿芝同志有了联系。他还有机会读了我党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经过张殿芝同志的介绍，他还认识了东阿县一些较早的党员，如：李常青、李健民等同志。

一九三八年李子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东阿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他当了新划五区的民政助理员，正式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二

一九三九年后的五区，横跨黄河两岸。在东阿、平阴两县的交错地区，纵横不过数十里，但是日伪军据点星罗棋布，炮楼林立不下十几个。

子光同志的父母是老实忠厚、胆小怕事的庄稼人，虽然也知道儿子去当八路干的是正经事，但总不肯让他去冒这个险。子光同志就先说服自己的妻子和兄弟，然后和他们共同劝说老人。家庭会开始后，子光同志先向老人讲了无国便无家的道理，说的两位老人连连点头。他的妻子和兄弟也都纷纷表示，子光同志参加革命，父母由他们孝敬，家务由他们承担。把两位老人说的抿嘴一笑，表示了对儿子的支持。

子光同志参加革命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可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工作是艰苦的。策略稍有不当就会适得其反。

子光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向党作了请示，利

用在当地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圣贤道做掩护，去进行党的工作。经过党组织批准后，他就主动去接近一个名叫张文孝的小道首，拜他为师。于是子光同志也就成了一个“道徒”。从此有了开展工作的合法身份。便在他的工作区域内，开始了党的筹建和发展工作。很快，子光同志的周围，便团结了一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青年学生，农民和知识分子。子光同志教育他们：在道的人，要老实忠诚，见义勇为，要团结广大受苦的群众，向那些无恶不做的坏人去进行斗争。在当前就是要和日本侵略者斗，要和汉奸卖国贼斗，他们是坏人的总代表。然后交给他们一定的任务去考验他们。把那些经得起考验的，再分批吸收入党。就这样在张道口、王道口、孙道口、汝道口、香山、丁口等一些村庄，发展党员二十余名，并先后在这些村庄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还通过党员动员几十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或当了地方上的干部，在一些学校换上或安插我们的人当了教师。这样，五区河西部分的村庄，尽管就在日寇据点

的周围，却处在了我党的控制之下。

三

随着形势的发展，子光同志的身份，也就由秘密到公开了。人们说：“怀明原来不是传道，他是一个吃了八路军迷糊药的人。只知道抗战打日本，连自己都忘了。”

子光同志是民政助理员，做好优抚工作是他的主要任务。全区有几户优抚对象，每户多少人，有无劳动力，有什么困难，他都了如指掌。对于他们的困难，他都能按照政策加以解决，那些没有劳力的户，他就亲自把优待的东西送到家中，个别优抚对象的家在日寇据点的所在村庄，他就夜间走访，为保证优抚对象的安全，把优待的东西，让其亲戚转给他们。

子光同志，对别人想的是如此的周到，做起工作来不知什么是劳累。但是对于个人的安危和家庭的事情从不放在心上。

一九四三年春节过后，他便离开了家，直到快麦收了，才抽了一个夜间会后的时间，把棉衣

送到本村王庆珍的家里。庆珍劝他到家看一看老人，安排一下家务，他却说：“算了吧！现在任务很重，下次再说吧！家里有兄有弟，什么事情也舍不了。就让他们代我尽孝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一九四四年初冬的一天，他在河东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消息，得知平阴城里的伪军要在第二天拂晓前，去东阿县城。他就连夜赶了回来，当找到部队时已是半夜时分。首长经过短暂的研究决定去消灭这股敌人。

那时的黄河水虽近枯竭，还必须乘船而过，可是夜间已没了艄工。子光同志就跳入已结了薄冰的冷水，推着船往返几次，把部队送到了彼岸，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歼敌任务。

黄河以西的日寇据点，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已基本上消灭干净。我对敌斗争的重点转向了河东。那时，平阴、东阿两个县城以及各据点的日伪军，正在做垂死的挣扎。今日清乡，明天剿“匪”。弄得老百姓日夜不得安宁。

为了早日消灭这些顽敌，子光同志就又接受任务到河东去开展工作。可是，河东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乍一去，必须利用点关系。于是他就找到他亲手发展的党员张从礼。张从礼同志在河东有亲友，还有他的一位启蒙老师，在白塔村。张的老师，是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叫阎殿瑞。他们二人在一天的夜间，就到了白塔他那位老师那里。子光同志这次去打扮的象个叫花子。阎老师对他的学生领来的这个陌生人，有些莫明其妙。张就说：“这是我的表哥，我刚从外地接他回来，断了盘缠，找点吃的。”

吃饭间，谈长论短，逐渐谈到抗日救国的题目上来，阎老师表示同情。张从礼便向他的老师讲了真话。阎老师并表示，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工作。还答应他的家可以做为一个落脚点。

又一天的夜里他们二人到了河东丁口伪付乡长丁连保的家中，丁是张的亲戚，到家不久，外山据点的伪军出来抢东西了，也到了丁家。这时，子光同志装做病人躺在炕上。敌人看见他长长的

头发，满脸的泥垢，也就不加追问地放过了他。

敌人走后，子光同志向丁说明了来意，讲了我党对敌伪乡村办事人员的政策。希望他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丁一一答应照办。以后还利用丁的关系在河东不少村庄开展了工作，并结识了一些能了解敌人内部情况的人。如在亭山头据点里做秘书工作的王兴岭等。

半年之后，敌人的内部情况不断被我们所掌握，他们所筹到的粮、款也时常为我们所截获。有些伪村政权也不那么听他们指挥了。几个独立敌人胆的敌人处在惶惶不安之中。可是原来不被据点认识的李子光同志，也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欲拔掉不可。于是平阴城里的大汉奸头子刘绪安就贴出了布告：“谁拿到李子光，按李子光的体重付给同样的一元一张的金票（日伪票）……”。

敌人的布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提醒群众要更加注意保护李子光同志的安全；另一方面也给一小撮汉奸、无赖提供了图财害命的机会。

一九四四年端午节那天，河东亭山头的汉奸头子刘传海，得知子光同志住在香山，突然出动大队人马前来捕人。敌人刚到村头，被一个地主的长工看见了。火速把消息报告了子光同志，子光同志不慌不忙地扛起锄头，装做下地干活人脱了险。敌人扑了个空，抢了一些东西，打骂了一阵老百姓，扫兴而归了。

党组织为了子光同志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调他去六区工作。子光同志接到调令后，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去后张道口交待工作。中午到小学去吃饭。万万没有料到，平时不被人们注意的一个图财害命的无耻之徒，偷偷给亭山头的汉奸送去密信。

子光同志交待完工作，离吃饭还有一点时间，他又去教室里指导学生写字。这时三个穿便衣的特务，提着匣枪闯了进来，向着有人活动的厨房扑去。子光同志发现敌人后，想乘机离开学校，刚刚走到校门口，敌人从背后开了枪，子弹在肩下穿身而过。子光同志边退边还击，到了大街上

迎面又来了两个敌人，一连开了几枪，打伤了李子光同志的腿，子光同志便跌倒在地。五、六个疯狗似的敌人一齐扑过去，把鲜血直流的李子光同志连推带拉地拖过黄河推上了亭山。宁死不屈的李子光同志又在敌人的牢房中，刑场上和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次日，子光同志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血迹已经擦净，伤口也已包扎好。一个汉奸头头出现在他的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兄你好些了吧？使你受苦了！我叫刘传海。咱们虽不相识，却久闻大名，小弟对你很佩服，我不会亏待你……”

子光同志一听，这个人就是大汉奸刘绪安的儿子刘传海时，就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把仇恨的目光象子弹一样射向了这个不共戴天的坏蛋。便斩钉截铁地说：“收起你的好心吧！你们刘家父子是何时变的种？把你们的祖宗都不要了，当了日本人的帮凶，还有脸站在中国人的面前说话？如果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就跟我一起干

八路军去。我们才真的不会亏待你呢！你如果已是死心踏地的汉奸，就赶快把我杀掉，到你的汉奸爸爸那里去领赏吧！说别的都是废话。”

刘传海，还想说什么，被子光同志一连声痛骂封住了嘴。

汉奸刘传海自知和子光已无法再直接对话，第三天把另一个据点——外山的汉奸小队长任之江叫来，让他出来帮忙。任之江是子光同志青年时期的“朋友”，又是邻村，想利用他俩的这种关系来劝说李子光同志归顺于他们。这一天的早饭后，任之江在一间很阔绰的小房子里，准备了上好的饭菜和衣服，等待着他的老朋友的到来。子光同志一进门见是任之江，骤然，火冒三丈。冷不防打了任之江一记耳光，掀翻了桌子，撕烂了衣服。随即大声喝斥：“你混蛋！难道你就忘了吗？我们是曾经发誓，饿死不吃汉奸饭，冻死不披汉奸衣吗？”

任贼急忙撤了几步，吱吱唔唔地说，“我……我做为你当年的朋友，出于对你的关心，总不

算错吧，年轻时无知，不知天高地厚……”

子光同志命令似地：“住口！年轻无知，还懂得抗日救国。你现在足智多谋当了汉奸。你自己这样做还嫌不够，又要让我来领受你的好意，真是无耻。”

任贼立即发觉和他这位当年的盟兄弟，完全没有了共同的语言和调和的余地。向他的喽罗使了个眼色，把子光同志又送回牢房。

敌人在软的失败之后，又来硬的，指使其歹徒对子光同志动了重刑。先用枪子撬肋条，又用火棍烙腋下。问子光同志：“还干不干八路，投降不投降？”

子光同志的回答是：“你爷爷活着就要干八路！共产党员宁死不投降！”

接着，又向子光的鼻孔里灌辣椒水。把子光同志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敌人始终不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刘传海这个小汉奸，无耐，只好把子光同志送到平阴城里的大汉奸刘绪安那里去。在押往平

阴，路过夏沟大集时，子光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对群众的宣传。从拉着他的车子上站起来说：“乡亲们！同胞们！我叫李子光，是当八路军的。今天我犯在了大汉奸刘绪安父子的手中，我知道，我要为抗战而死，但我死而无怨。我们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这时，敌人恐慌万状，怕他再讲下去，用绳子勒住了子光同志的嘴。

然而，赶集的人群轰动了。烈火在胸中燃烧，仇恨从眼中射出。大有和这伙汉奸决一死战之势。这些平时张牙舞爪，气壮如牛的敌人，象过街的老鼠一样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危险之地。

李子光同志被捕后，我党曾多方设法营救。一方面指示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加强了统战工作，委托刘绪安的仁叔殷付尼和他的仁兄陶长义从中周旋。他们也曾表示，要尽全力把这件事情办好。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子光同志的领导、战

友、亲属和群众都以关切、焦急和忧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位亲人的归来。人们从日出盼到日落，从傍晚等到黎明。一天，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和统战人员都回来了。但是他们带来的不是喜讯，而是噩耗，人民的好儿子——李子光同志英勇就义了。

我们派去的营救工作者，都为李子光同志的牺牲而悲痛，更为没有完成任务而难过。

我们的统战人员说：“刘绪安开始向我们表示，只要李子光答应一句今后不再当八路就可免他一死。”

“我们见到子光后，他首先表示感谢党对他的关怀，并说：“根据我们被捕后的情况和对敌人的几次较量来看，我活回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请转告领导，我绝不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要和他们针锋相对，让这伙汉奸见识见识，怎样才算得上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后来他又说：“你们不要为我的生还费力。”听说刘绪安也曾几次和子光同志直接见面。但每次都被子

光同志讲的理屈词穷，刘绪安就不敢和子光同志见面了。”

他们接着说：“经过几次较量之后，刘绪安见子光同志软硬不吃，就放弃了要制服李子光的心，决定要杀害他。最后一次我们和刘绪安去见面，他翻了脸。说我们使了八路军的钱，诚心要拆他的台，并威胁我们如果再为李子光的事去见他，就和李子光一律同罪。”

就这样，凶恶残暴的敌人对李子光同志用尽了卑鄙和残酷的手段之后，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凌晨将他杀害了。

为了纪念这位宁死不屈的战士，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启迪后代，东阿县抗日政府于该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子光同志的家乡附近的大集镇——黄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安葬于香山脚下。英烈与香山同存，忠魂似黄河永生！

东阿县民政局供稿

阿 胶 史 话

阿胶，以原产于东阿得名。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种名贵中药，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秦汉时，无名氏所著《神农本草经》，曾把阿胶列为药中上品，即君类。书中曾写道，阿胶“生东平郡，煮牛皮作之出东阿”；又云：“阿胶，一名傅致胶，味甘平，出东阿”。这说明，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年，东阿县劳动人民，就从事熬胶事业。而且，当时主要原料是牛皮。以后，历代医药学家名著，无不对阿胶予以大量的描述、记载和充实。并在药理研究方面，逐步广泛和深入。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中，对阿胶的功能，也有所论述。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第一次对阿胶进行了“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等方面的全面论述。并引用陈藏器言：“诸胶皆能疗风止泄

辅虚而驴皮胶主风为是此阿胶所以腾诸胶也”。说明那时已知驴皮制成之阿胶已胜牛皮胶了。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曰：“近日浙人所造黑驴皮胶，其法一如造阿胶式，……与东阿所造无二……”。说明江浙一带，自清代起，已掌握了熬胶的技术。国医周志林在《本草用法研究》中，对东阿阿胶又进行了极为全面的论述。内容包括“品状”、“性味”、“归经”、“功效”、“研究”等项。尤其在研究一项里，以大量的篇幅，引用中医药理，解释了阿胶的功能。从山东《兖州府志》、《济南市志》、《东阿县志》中，都可以查阅到许多有关东阿县自古以来，以盛产阿胶闻名全国的记载。阿胶熬炼术，不仅传到南方诸省，北京、天津、河北等北方省市也已掌握了熬胶技术。但在解放前，全国还没有一家正式阿胶厂。就是在“阿胶之乡”的东阿县，也是多以家庭付业形式出现。熬胶技术成了“祖传秘方”。东阿不少商人，从营利观点出发，雇工熬胶，也仅是短期。如东阿杨××，解放前在济南东流水

经营阿胶生产，从家乡聘人去熬，也是前店后厂，规模有限。

东阿阿胶，在质地、性状、药效方面，之所以高于他处阿胶，不仅在熬胶工艺与技术上不同，更重要的是东阿水质异于他乡。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谈到：“……东阿有井，大如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者即此也。其井乃济水所注，取井水煮胶，用搅浊水则清。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痰，利治淤浊，及逆上之痰也。”

“……以阿县城北井水作煮者为真，真井官禁，真胶极难得，货者多伪，真胶以乌驴皮得阿井水煎成乃佳尔”。周志林在《本草用法研究》中也讲到：“阿胶用黑驴皮，以阿井水煎成，阿井在山东为济水所伏，流之处，其水清而且重。无论尘渣皆可澄下，即以少许用搅浊水，亦能立清……。”

臧励和等编著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对阿井水也有较全面的记述：“……《水经注》东阿城北门内西侧有大井，其巨若轮，深七丈，岁常煮熬入贡，本草所谓阿胶也；《唐国史补》齐

人以阿井煎胶，其井比旁井水重数倍。《梦溪笔谈》东阿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清医学家徐大椿编著的《神农本草百种录》说：“阿井之水较之旁水重十之一二不等”。从上述大量历史记载可知，历代医药学家，十分重视熬制阿胶所用的水质，一致肯定了东阿阿井水质的地域特点。

东阿，乃历史上的古县。秦时已立治于故城（今之阿城、属阳谷），古阿井即在今日之阿城西北。临近阿井的村庄，如王庄、岳庄、阿城、小赵等，一向就有取阿井水熬胶的技术和家庭付业。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县城多次迁徙。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为避水患，县城迁谷城镇（即今平阴县东阿镇），阿胶生产中心，一度东移。清末，东阿镇东门里，曾有规模稍大的阿胶作坊。因而，有关阿胶的传说，又带上了许多神话般的色彩。民间把熬制阿胶，说得神乎其神。说什么：“墨黑的小黑驴，白蹄白肚皮，吃过狮耳山的草，喝过狼溪河的水，到小太山上打仨滚，

扒下来的皮，用金锅熬，银铲拌七七四十九天，才能熬成阿胶”。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过去所产阿胶，都要有县太爷的硃红大印才算合格。才能作为贡品，上献帝王，这确是史实。黑驴白蹄之说，纯属无稽之谈。现在，东阿阿胶，全用皮大而厚，含胶率高，质地纯正的驴皮。在选料上，是注意了传统产品对原料的苛求。

阿胶的传统性状是：光黑如莹漆对光照半透明；显血红色；质硬而脆；断面光亮，均匀细致，无杂点、气泡、油球；味微甘，气微，凝胶箱中阿胶表层，有清赵上敏所说的“黑色，带绿顶猪鬃纹”（《本草纲目拾遗》）。阿胶为上等滋补药品，性平、味甘、滋阴润燥，养血止血。主治虚癆咳嗽，痰中带血，能力补血液，令脉络调合，血气无阻；善治崩漏带下，为安胎圣药；及痢疾久虚，骨蒸内热。入肾以润水，入肝以清火。女人血枯，男子少精，服之无不奏效。

正因为阿胶是一种珍贵的药品，所以历代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把它列为延年益寿的滋补品。

东阿民间的熬胶业，也代代相传。在历史上，东阿阿胶的商标，用“东阿县印”，已有数百年史，并荣获多次褒奖。1914年，在山东省全省物品展览会上，获得褒奖证书和最优等褒奖金牌。1915年，在巴拿马举行的国际商品展览会上，曾获国际奖状。1933年，实业部国货陈列馆三周年纪念会上，获得二等奖状。但由于社会时代的限制，二千年来的发展，是缓慢的。在东阿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从事阿胶生产的人不少，都是以家庭付业的形式出现，生产方式落后，原料缺乏，卫生条件不好。有的还纯以营利为目的，以假冒真，致使质量不能提高。东阿获得解放后，才使这一古老的传统名贵中药，枯木逢春，得到发展和提高。不论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东阿党政领导和广大职工，对祖国，对故乡，是做出了应有贡献的，无愧于长眠地下的炎黄列祖列宗。

“抽刀断水流复流”。历史的长河在迂迴曲折中奔腾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

白白地流逝。……

1953年，随着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东阿县药材公司，开始了带有地方色彩的阿胶生产。他们每年农历八月到次年三月，适于阿胶生产季节，派人去素有“阿胶之村”的小赵（今属东阿刘集公社），聘请五一—六名熬胶艺人，来东阿县城熬胶。场所就在铜城镇北关河滩上，“东临古道西靠河，四顾茫茫禾满坡，数间敞棚遮风雨，朝迎红日夜伴月”。仅有几间敞棚，连垣墙都没有，这就是阿胶厂的雏形。熬胶工人付给临时工资，等到天热不能凝固阿胶时，他们再返回故乡农村种田。

1959年，阿胶生产改属工业局领导，才正式建立了东阿阿胶厂。十月，郭玉才同志（现在东阿轴承厂工作）任第一任厂长。由徐光福去小赵招来六名熬胶工人，把原来东阿皮革厂的职工，全部合并到阿胶厂。每年农历三月至八月，不能熬胶时，就搞皮革生产。新建的阿胶厂，共有人员十三名，敞棚八间，简陋西屋六间，用以晾胶

储放什物。工人的工资在三十五到五十三元之间，因为他们都是技术工人，政府在待迁上有所照顾，熬胶技工赵西成技术最高，被定为五级。他过去曾在济南、阿城等地熬胶多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阿胶厂建立后，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刻制了公章，配备了行管人员。由于当时的业务量不大，保管和会计由一人兼。原料由省药材公司从德州等地调拨，产胶二万斤。商标为“东阿牌”。其余原料，如冰糖、豆油、南酒等，由商业局按计划供应。所产阿胶，经省化验合格后，交省药材公司。

泡皮，洗皮在西河涯进行。敞棚下有大锅二口，小锅（汁子锅）三口，用手工切皮。有百分之二十，归自己处理。每批阿胶，都由保管兼化验员黄维民去省化验，合格后方准出厂。要达到质量要求，一没设备，二没仪器，全凭眼看，鼻嗅。阿胶的好坏，一是配料，二是火候，三是晾胶。偷工减料不行，火不适宜不行，大了易糊，

小了不化。胶晾时间长了裂,短了不凝固。因而,没有一定的技术,是不能从事这项生产的。

1961年,郭玉才调离工作后,由阮法成继任厂长。后有王尚仁同志(现在东阿运输公司)任厂长。这时厂子有所扩大,全厂有固定工人二十六名。阿胶生产旺季,均找临时工,最多达七、八十人,归县卫生局领导。增盖南屋八间。到1965年王尚仁调离阿胶厂时,已有垣墙和大门,成了一个比较严紧和象样的小型工厂了。年产量达三万斤。每年所需驴皮,从宁夏调入。切皮由原来手工切皮变成了半机械化,工人们创造了脚踏切皮机。晾胶厂房不足,有一部分租借民房。在这段时间内,新的技术工人在成长。现在他们都成为技术骨干,有的已退休。如:肖存绪、陈玉兰、刘月英、刘绪香等。

阿胶厂在前进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斗争。那时有的技术工人,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想用技术卡工厂的脖子,以工资少为借口,纷纷离开阿胶厂,想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回村

另立“山头”。由于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缺乏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唯利是图，用破皮绳，坏杂皮熬假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件事雄辩的说明，高超的技术必须用正确的思想作指导，才能有所作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溶于为人民服务的大事业中，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受到人民的重用。反之，必被历史淘汰。

1965年，王尚仁调离，任曲维忠为厂长。之后，杨庆芝接任。阿胶厂归商业局领导。除生产传统阿胶外，还有鹿茸胶，龟板胶等。装璜质量也高于以往。

1969年，随着生产的发展，东阿阿胶厂进行迁厂和扩建。厂址由北关迁到县城东北角，风景优美，绿树吐翠的青年路北首。排排瓦房鳞次栉比，柏油路直通厂内，迎门是太湖石垒造的人造山和汨汨喷泉。1975年再次扩建，盖起生产大楼两幢，1979年，改为省药材直属厂子。产量比1959年增加近六倍，质量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始

终保持着东阿阿胶的传统特色。在原材料及燃料消耗等经济技术指标方面，均降到较低水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阿胶厂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除老厂长杨庆芝外，新配备了有专业知识，大学毕业，年富力强的实干家刘维芝当厂长，领导全厂的生产和技术设备的改造更新。使阿胶生产，基本上结束了两千年来的落后生产方式，初步走上了机械化的文明生产，步入了现代化工厂的行列。

东阿阿胶厂，现有职工一百八十四人。近几年来，产值、利润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和百分之九十九点四。由于原料供应紧张，增加产量较难，他们向革新挖潜方面努力。计划今年下半年利用下脚料生产阿胶补浆六百万瓶。再接受兄弟省市来料加工，产值较去年翻一番。目前，安徽、宁夏已来厂签订合同。

在产量上升，品种增加，质量提高的情况下，各项成本都逐步下降。今年与1979年相比，阿胶

成本每年递减百分之三；补浆成本平均每年递减百分之十三。煤耗平均每年递减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电耗平均每年递减百分之四十三点一。东阿阿胶厂，1979年被评为地区和省药材公司先进单位，产品被评为山东省优质产品。198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总局优质产品和国家优质产品，荣获国家质量奖金质奖章。1982年在全国第二次阿胶质量评比中，又获总分第一名。1983年三月份，在全省医药系统先进集体代表大会上，省医药局授予“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创名牌不容易，保名牌更难。东阿阿胶，自从问世以来，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劳动人民和医药工作者、技术人员，对生产工艺和要求，不断充实、发展和提高。使产品质量，除达到国家药典1977版所规定的全部标准外，还保持古老阿胶的传统性状：光黑如莹漆，对光照半透明，呈血红色等特征，剂量准确，装璜美观大方。要达到高质量，高标准，夺取国家金质奖章，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热门货，阿胶厂

全体人员，是付出了极大努力的。不尚空谈，注重实干。

1979年以来，厂里成立了质检股，建立了实验室，常规化验室，质量档案室，产品留样观察室等。增置了各种化验计量器具，配备专职质检化验员，车间班组检验员。先后派人参加全国质检学习班，省化验员学习班，到威海、济南、上海、杭州等地进修学习。建立了质量分析制度，质量档案制度，产品留样观察制度，并设有专职质量巡回检查员。制定了产品内控质量标准，除对国家药典规定的水分、灰分、重金属、砷盐严加控制外，又增加了本厂内部生产过程中十五项内控质量项目。对含氮量，挥发性盐基氮，水不溶物，杂菌、霉菌含量，油孔，色泽等严格进行控制和检查。1979年以来，成立了QC小组，经常开展质量分析和攻关活动。为了搞清水质与阿胶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十个水样，四百多个项次的全面水质分析，证实了水质重，矿物质含量丰富的水，熬胶最好。通过阿胶灰分的光谱分析与定

量分析，发现阿胶灰分，基本是由对人身有益的金属离子组成。改变了“灰分就是杂质，越低越好”的习惯说法。在北京中药研究所，上海生化研究所的协助下，分别进行了常压及不同压力条件下，氨基酸含量的测定，阿胶分子量的测定。确定了正确的化皮压力，提高了阿胶的内在质量。为了攀登质量高峰，先后和全国十七个省、市二十多个厂交换了阿胶样品，认真分析检验，取长补短。并派人去上海、杭州、西安、芜湖等地学习。经常走访全国各地医药部门及用户，征询意见，改进工作。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先后研制成功了阿胶酒、阿胶补浆、阿胶蜜、阿胶参茸精等新产品。目前，正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变化情况，转入治疗性中药研制，龙骨素等新产品，不久即可问世，投放市场。

历代医药学家，谈到阿胶时，都提到水。看来，东阿阿胶的名贵与水质不可分割。以前，阿胶的功能，只从临床经验来谈，说不出深刻的科学道理，所以产生了种种神秘的传说。只有在科

学技术走向高度发展的今天，才能揭开这个秘密，科学的予以阐述。历史上的东阿故城阿井，解放后虽划属阳谷，今日东阿阿胶厂虽不再取阿井水熬制，但质量不仅保持了传统特色，而且又有所提高与发展。所用的水，与古阿井，系同一地下潜流。这是东阿这块土地，得天独厚的地方。理应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充分利用地利。

通过山大及省地质局化验可以明显看出，古阿井水与现东阿阿胶厂用水，在比重上是较高的（1·0036、1·0038）与古代医学家论述一致。这两地的水质成分极相似，金属阳离子、阴离子、固形物的含量都较高，水中溶解的矿物质都较多。其中钠、钙、镁、铁、铝、锰等及其他微量元素都是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必需的。而铅、砷等对人体有害的元素均未检出。这种比重大，含矿物质高的水，最适于熬制阿胶。南北朝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写道：“此水（指古阿井水）是河南省济源县济河的一股地下潜流。水流经地下岩石和砂砾层滤过，不但起到清洁作用，同时也

渗入了钙、钾、镁、钠等矿物质，故色绿质重，每担水比一般井水或河水重三、四斤，用此水与驴皮配合熬制成胶，帮助药性发散，迅速起到疗效。由于水质重，在熬煮过程中，杂质及飘物便于打捞上来和切制胶片，虽炎夏酷暑也不变形变质”。

近几年来，阿胶厂工人，曾用井水、冷沸水、蒸馏水进行提杂试验，结果井水最好，冷沸水次之，蒸馏水无法提炼。因其中矿物质含量太少。近代科学结论与古代医学家的观点，一致认为阿胶的熬制过程，最主要的是提取胶片和去杂。在提炼过程中，正是这些含矿物质较多的水，利于杂质和纯胶的分离。

阿胶的主要原料是驴皮。驴皮是由上表皮层，真皮层，皮下层三部分组成。最佳的阿胶，应来源于真皮层中的纯胶。熬制中，由于皮下层和上表皮层中含有较多角质成分，溶化较差，真皮层因易于水解，在相同条件下，水解程度深，分子量小。但它们混在一起，还必须经过提纯。

把上、下皮层生成的胶体还有脂肪、烂肉等提出来，这就需要加入电解质。而东阿熬胶用水，矿物质含量大，是理想的电解质。胶体溶液分子，都带有相同的电性。加热后，胶体分子相互撞击，由同性电荷相斥的作用而分离。当一部分水气蒸发掉，分子离子的浓度越来越大，达到了一定浓度，离子的电性，将要中和掉胶体分子上的电性，使胶体分子重新聚合。聚合的分子团，因结构松散，比重较小而上浮。首先聚合的胶体分子，是上、下皮层中的大分子胶体，这就是杂质。当这些杂质，经过几道工序打捞去除后，锅中的阿胶也就水解到应有的程度。这时的阿胶透明度高，显出血红色，质地均匀细致，为纯净的优质阿胶。没有比重高、含矿物质多的水作电解质，是极难生产出上等阿胶的。

东阿阿胶厂，在荣誉面前并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在不断的探索。在总结前人生产经验的同时，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他们对阿胶灰分的分析研究，丰富了我国的医学宝库。历

来，人们认为阿胶中的灰分就是杂质，因而灰分越低越好，这是不正确的。他们通过有关部门的化验，找出了可以成立的科学理论根据。请看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山东省地质厅实验室对东阿阿胶厂的灰分作了化学分析。从化验结果可看出，灰分中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由十七种元素所组成的氧化物和无机盐类。灰分中的金属离子，主要来源于驴皮和水，而且这些金属元素都是人体所需要的。钾、钠、钙、镁是构成人体血液的主要金属元素，而阿胶这一治疗血液病最有效的中药材，恰是这四种金属元素含量较高。其他如铁、锌、铜、锰、硅等，也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没有或缺少这些微量元素，人体就要发生某种疾病，因而，强调阿胶中灰分越低越好，或者把阿胶中的灰分看成是杂质的观点，是不恰当的，（生产中掺进去的泥砂、及其他金属构成的灰分除外）。如果从生产工艺上，设法除掉这些有益成分，使阿胶中对人体有益成分降低，还会影响到阿胶药效的发挥。

阿胶的粘度，也是阿胶优劣的标志之一。它反映出阿胶的粘性，拉力状况。粘度的大小与制胶时所用的温度、水解程度密切相关。为提高阿胶质量，东阿阿胶厂近几年来，把粘度列为内控项目之一。其出厂产品，经省药检所测定，粘度一般在6—35厘斯之间。

阿胶为上等滋补药品，似乎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深知。科学家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现代不少科学工作者，已对阿胶作了大量化验分析和试验，揭开了阿胶功效奇特之迷。原来阿胶中，含有百分之十五点八四的氮和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四的蛋白质。是由丰富的氨基酸所组成的高蛋白物质。从元盘阿胶测定的阿胶分子量约在二万以上，这样小的分子量利于人体吸收。加之丰富的氨基酸成分，高的蛋白质含量，是其成为高级滋补品的主要原因。难怪香港、日本有些中老年人，就很愿服用阿胶。据反映，在日本得了贫血症，若服不上阿胶，深为痛苦。在国内患血液病的人，也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阿胶上面。似乎只要

弄到阿胶，病就能好。山东医学院药理教研组，还用阿胶做动物试验，进行药物研究。其试验结果证明，阿胶有加速血容量、红细胞及血红蛋白的恢复作用，能生血。还能影响钙的代谢，增加血清钙量。在止血方面，能使血液凝固增加。还能治疗肌变性症。

东阿阿胶厂，除在实验室研究外，还在上海、北京、南京、济南、青岛等地搞了阿胶临床疗效观察，及时作出总结，从中吸取经验，不断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他们每天收到群众来信数百封，接待来访者近千人次。一致反映其所产“东阿牌阿胶”，在治疗贫血、咯血、恢复血色素、治疗妇女崩带下等病方面，功效显著。尤其深受上海、两广、两湖、闽苏、海南岛等地人民欢迎。如温州利群塑料厂黄平，常熟饮食公司李瑞霞，青岛汽轮机厂刘惠莉、湖北黄梅潘志诚等，均在来信中反映了阿胶的妙用。对质量予以赞扬。据青岛外贸部门讲，阿胶在国外也深受欢迎。广交会上，是属照顾外商的优惠

商品，外商曾一再要求增加订货。香港大公报，曾两次作了专题报导。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山东阿胶远销国外”为题，写道：“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医药宝库中，有一种名贵药品，名叫阿胶。……山东省东阿县，素有“阿胶之乡”之称，古典医书（神农本草）中记载：“阿胶，一名傅致胶，味甘平，出东阿”。这里生产的阿胶，远销中外，享有盛名……现在，东阿县每年都有十万多斤，质地坚实，色泽美观的阿胶和大量的鹿角胶黄明胶和龟板胶等运往国内外市场，深受群众欢迎。目前，东阿阿胶经国家检验机关鉴定，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随着国内外需求量的增加和质量的高标准，几千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开始向生产的深度与广度进军，向机械化要劳力，要质量，要时间。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试制成功了阿胶化皮机，利用蒸球加压化皮，结束了相沿若干朝代的敞口常压锅化皮工艺，提高工效三十倍以上，出胶率增长

15%，工艺改革后，质量稳定，效果良好。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开了全国性的鉴定会，通过了鉴定书，批准在全国熬胶行业推广，结束了阿胶生产某个环节的落后状态，为阿胶生产全部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闯出了路子。

目前，他们已与青岛某研究所联合设计熬胶切皮部分生产新工艺。增加空调装置，试行密闭管道化生产。还与山东化工学院联合研究，搞微波和红外线生产，向科学技术的更高境地进军，争取明年彻底结束阿胶生产季节性落后状态。

积两千余年阿胶生产经验，又插上了现代科学翅膀的人们，在中华崛起的历史新时期，正在使阿胶这颗祖国医药明星，在东阿这块宝地上，大放异彩，光照千秋。

冀

曹植和子建墓

出东阿县城，南行二十公里，到达风景秀丽的鱼山。在山之西麓安息着三国时期，建安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曹植。千余年来，吸引着不少文人学士，来此凭吊，赋诗撰文，寄托哀思。东阿人民，也对这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诗品》）的文才，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敬仰。

鱼山，汉武帝时称吾山。山上有留舒城，济水（即今黄河）在山脚下流过。山顶林木苍翠，山下农舍排排。在山北辽阔的平原上，点缀着暖暖村庄。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曾在山上书院就读，多次登山远眺，慷慨悲歌，抒发自己怀才不迁的情怀。山寺的钟声，伴随着山下的流水，更增加了诗人的寂寞的凄凉。只有山民的善良淳厚，农家的天伦之乐，给他些许安慰。面对曹丕父子的迫害，痛苦万分。“初，

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三国志魏书）。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徙封陈王。十月，怀着悲愤与世长辞。其子曹志，遂父遗囑，丧事从简，归葬鱼山，“遂营为墓”。

人民同情他的遭迂，热爱他的诗赋辞表。根据他的洛神赋，后在鱼山山顶，修建渔姑庙（又叫神女祠）一座，内塑神女像。祝愿他与甄氏的爱情，生不能成全，死后如愿。

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在墓北侧，树碑一座。高1.7米，宽1.1米，正书兼用隶篆。刻有碑文二十二行，计字946个。后湮没大清河中（即今黄河），至清代始捞出，还置墓侧，并建碑楼保护。其碑文曰：曹子建墓道碑（摘录）：

王诤植字子建沛国譙人也洪源与九泉兢深崇塞与三山比峻……词彩照灼子云遥惭于吐风文华理富仲舒远愧于怀龙又能诵万卷于三冬观千言于一见 才比山藪 思并江湖 清词菀菀若聚葩之蔚邓林 绿藻妍妍如河英之照巨海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为临淄侯 都不以贵任为

怀 直置清雅 自得常闲步文籍偃仰琴书 朝览
百篇 夕存吐握 使高据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园
振藻独步之才 陪游于东阁 黄初二年 奸臣谤
奏 遂贬爵为安乡侯 三年进立为王 及京师、
面陈滥谤之罪 诏令复国 自以怀正信而见疑
抱利器而无用 每怀怨慨 频启频奏，四年改封
东阿王，五年以陈前四县封……十一年里 频频
徙都 汲汲无欢遂发愤而薨 时年四十有一 即
营墓鱼山 傍羊茂台 平生游陟有终焉之志 即
而年代复远 兆塋崩沦茂响英声 远而不绝
至十一世孙曹永洛……面陈昭皇 亲训圣诏 比
经穷讨 皆存实录，蒙勅报允 兴复灵庙 ……遂
雕镂真容 镌金写状庶使休休相度永劫而不泯七
步文宗传芳猷于万叶者也，其词粵惟王磐石斯固，
缔绪悠长波连溟渤枝带扶桑分珪作瑞 建国开疆
蕙楼茵阁远迈灵光其器调高奇 风格疏朗 谈人
刮舌 灵蛇曜掌 东阁晨开 西园夜赏 松花挂茂
玉 润金响[〓]声驰天下道冠生民 才惊旷古 德重
千钧混之不浊 磨而不磷 如何一旦 萎我哲

人墓山舟易央日车难驻一谢人间长遵挺路 风哀
松柏 坟穿狐兔 何世何年 还成七步墓 迺考
惟昆，廓定洪基，受图膺历 运合紫微一辞皇阙
永背象掇 风随日转 响逐云飞墓。

碑文除写了兴修经过，歌颂了曹植的文采外，还简略的介绍了他的生平，讴歌了曹嵩、曹操、曹丕，把曹植的不幸，归结为“奸臣进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封东阿王应为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太和六年封陈王。死后谥“思”，后世谓之“陈思王”。

曹植墓穴，傍山西向，墓口为汉砖镶砌，呈半园形。人进入需低头。进去洞门以后，为一方形墓室，约三米见方，四壁用竹纸贴，纸呈黄色。过第一墓室，又一园洞门，逾后，为第二墓室，形状大小与一墓室同。过二墓室又一洞门，塞以砖石，据村人谈，内有陷井、蛇蝎等物。后随无人问津。1951年平原省政府文管部门，曾探墓搜奇，在两个墓室中，曾获陶器及殉葬物品132件。1977年3月，又发现一阴刻铭文砖，重14.2公斤

(0.43×0.2×0.11米)，色青质坚。经故宫博物馆顾先生鉴定，曹植葬鱼山可信。从挖掘情况来看，植死时生活贫困，葬礼菲薄。在封东阿王的三年中，没有残酷的敲骨吸髓，鱼肉人民。反而对人民的疾苦，寄予深深的同情。这大概也是这位诗人，在东阿人民心目中，获得纪念和敬仰的一个因素吧！？据传，建国前后，吴德同志曾来此，并把曹植生前用过的一把宝剑带去。至于后来如何处理的，无从知晓。

汉时的鱼山，风景秀丽，气象万千。山前有“吾山书院”，秀野堂建筑辉煌，掩映在绿树丛中。堂前洗砚池，金鳞游泳，有吐墨状。堂后有竹台，海棠曲径，北通螺亭，亭周水波荡漾，芰荷间植，香气袭人，鱼戏莲间。秀野堂东为听松轩，斜径蜿蜒，松风飒飒。轩东石崖有“垂云洞”、“绿荫居”，流觞曲水，松柏垂荫。游人至此，甘泉自酌，毛发顿爽。沿羊肠山径攀登，更上有“四眺亭”、“夕照轩”，“倒影阁”，均在山之半腰。菽亭后有水流飞瀑，石桥横涧，北望郁

然有深秀之气，乃子建墓与碑祠。其占地数亩，称“羊茂台”。由台向东历级而上，可至绝顶，是曹植读书处，名柳舒城。纵目东南，群峰耸翠；俯瞰山下，河水奔流，极目万里河山，令人心旷神怡。

明朝黄哲过东阿，谒植墓，写诗一首：“寂寂荒邱汶水滨，一间祠屋四无邻，豪华绝代空流水，文藻千秋尚有神。暮雨孤村聊驻马，春风芳草几愁人。舷歌镇日喧前渡，谁泊兰舟薦绿苹”。

目前的鱼山子建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文物复查时，又将隋碑及碑楼列为地区保护单位，并拨款修复。第一期工程1981年底竣工。全面修复计划，正在酝酿中。碑楼焕然一新，碑文清晰醒目。唯碑上曹植石刻相模糊不清。来考察、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估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照下，全面恢复汉时面目后，将成为鲁西重要旅游胜地，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将放出新的光辉。

曹植，字子建，生于汉末初平三年(公元192

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是魏太祖武皇帝曹操的第三子，为卞后所生。也有的书说他是第四子，那是把刘夫人所生的曹昂计算在内的缘故。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155—220），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卞皇后生文皇帝丕，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三国志，魏书）。在这二十五人中，除曹植一母同胞四人外，较有名气的，还有曹昂、曹冲、曹彪等。

《三国志，陈思王传》载：“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余岁诵读诗书，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看来，幼时的曹植，十分聪明，是位神童。从小喜爱文学，记意力颇强。特别在建安十五年冬天（公元210年），曹植十九岁时，邺城（今河北临漳）铜雀台建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陈思王传》）风华正茂的曹植，成思敏捷，下笔成章，深得曹操喜爱。认为他是诸子中“最可定大事”

的人。再加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所以结交了不少文人。如杨修、丁仪等，使他更加才气横溢，不可一世。曹操几次想立他为太子。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公元214年)封临淄侯。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增邑五千，并前万户”，达到了他一生幸运的顶峰。后来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常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违反皇纪，放荡不羁，逐渐失去了曹操的宠爱。”

“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术)之甥，于是以罪诛修”。曹操对曹植失去了信任，怕立曹丕为太子后，曹植争位，引起家族内乱，想办法先清除植的朋党，借故杀了足智多谋的杨修，曹植开始走下坡路。如果这时的曹植猛然省悟，弃旧图新，提高警惕，严格要求自己，或许局势有逆转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陈思王传)。

曹操不愧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非常爱惜人才。曹植犯错误后，仍对他抱有希望，还给他个立功的机会，叫他去与关羽作战，救出曹仁。但他却醉的不能上马，彻底叫曹操凉了心，这是咎由自取，怨人不得。《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偁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怨也”。是说曹丕听说操将委植重任，怕他大功成后，获得父亲宠爱，自己做不成太子，继承不了王位。所以借口给他贺喜、送行，用酒灌醉了他，使他彻底在曹操心目中垮了台。曹丕做事委实太毒辣，但曹植也未免太没头脑了。二十八岁的堂堂男子汉，口口声声想立功建业，竟因贪杯，被人愚弄到如此地步，以致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可叹！！

建安(汉献帝年号)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于同年十月废汉自立，做了魏国皇帝(魏文帝)，改年号为黄初。他怕曹植夺他的王位，于是先杀了他的心腹丁仪、丁廙，派监国使者灌均，把曹植软禁了起来。后又以“醉酒悖

慢，劫胁使者”罪名，抓了起来。“令东阿王七步成诗，不成者行大法”（《世说新语》）。先以斗牛图为题，曹植一挥而就，曹丕愕然，无由杀戮，但并不甘心，反讥笑他诗情不高，诗太露，写有几个牛字。又进逼一步，曹丕先指自己，再指曹植说：就以你我为题，七步内作成，不许有“兄弟”字样，否则行大法。曹植未走七步，其诗立成。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时他母亲卞皇后赶了来，怒斥了曹丕，保护了曹植。虽然没敢杀掉他，到底还是贬爵削禄，削去王位，贬为安乡侯。这是封建世袭制家天下的罪恶，充满着血腥味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但从这里也可看到曹植的聪明智慧，文才出众。因此，这段七步诗历史故事在民间流传至今，树为幼儿学习的楷模。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封郾城王，黄初四年徙封雍邱（今河南杞县），一直处于被压抑迫害地位。曹丕死后（226）年，曹睿做了皇帝，

曹植曾一度高兴了一阵子，以为他这个当阿叔的，或许有机会施展才能，得到重用，曾几次上书皇侄，不但不被采纳，反而防范更严。物质生活简陋不堪。兄弟亲朋之间，不许往来。“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号称六易，居实三迁，连迁瘠土，衣食不继”。（《求通亲表》）他含怀才不迁，报国无门的悲痛心情，象囚徒一样的在曹丕父子迫害下，凄惨的走着人生的路。“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而薨，时年四十一岁”（三国志，陈思王传）。

曹植的一生是短暂的，充满着悲愤、哀愁与血泪。他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什么建树，但却在文学上给后代作出了贡献。在囚徒般的逆境中，写出和留传下八十多首诗和四十余篇辞赋表章，“粲溢今古，卓而不群”（《诗品》）。他善于向民歌和乐府学习，开创了五言诗新时代。词藻华丽，内容丰富。充满着鼓舞斗志，引人向上的爱国爱乡情感。他的作品以曹操去世（公元

220年)为界,前期充满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豪情满怀,以《白马篇》为代表作;后期则因壮志难酬,横遭迫害而多呈悲愤与凄凉。“赠白马王彪”可代表后期。今录于下:

白 马 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历马登高堤。长驱逐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何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赠白马王彪〔并序〕(略)

在我国后代的评论中,分抑植派和褒植派。褒者,把曹植横加吹捧,极力粉饰他,礼让天下

与曹丕，叫丕当皇帝，自己不做。隋朝王通《文中子·事君篇》云：“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不会结党营私，处处求教于杨修，取宠于曹操，想争太子位了。按封建制，长子为太子，继王位，似乎天经地义。而他是老三，本不应立，在曹操意欲立他的时后，应明确告操立丕。杨修等人在操前推荐讲情的时后，也应劝阻才对。明明是他“私出司马门”、“植醉不能受命”，使曹操“悔而罢之”，改立了曹丕，这哪里是高姿态让天下呢？为了提高他的道德地位，成全他的“忠臣”美名，一会说他“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魏志，苏则传）。似乎曹丕废汉后，他为忠于汉帝而哭。一忽儿他又上表求自试，欲“当一校之队，统偏师之任”，征蜀伐吴，“擒权馘亮，歼其丑美”，为魏效劳。被丁宴捧为“危言激烈，如见忠臣之心”。他究竟忠于谁呢？令人莫名其妙。

曹操统一了北方后，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广行屯田，减轻赋税，

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在用人方面“兼收并蓄，任人唯才”。使许多文人学士，义士武侠，寒门书生，草莽英雄，齐集在他的周围，出现了空前的繁盛的文治武功。而曹植却极力反对“公族疏而异姓亲”（《陈审举》），政治上是没有建树的，武功上也不怎样。他虽然有“拯世济物”的理想，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为已任，怀有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没有认真去实行，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扼杀了他。在他十九岁到二十九岁的十年黄金时期，深得曹操宠爱，年青力壮，又处于北方未平，群雄争战的年代，满可以象“白马诗”中的英雄一样，驰骋疆场，杀敌立功；或象郭嘉等人，运筹帷幄，出奇制胜。而他却醉生梦死，饮酒不节，过着纨绔子弟的放荡生活。以致身败名裂，自己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有的却把曹植说的一无是处。说他“恃宠骄纵，自鸣清高”，“飞扬跋扈，不守纪律，只是风流才子”。在“兵祸连年，疠疫猛恶，千里萧条，人民涂炭的时代”，却“陶醉酒肉，目中无

人”。还说他“只知亲亲而不知尊贤，满脑的封建意识”，“用贤以安民，即使失位，于道何妨？”

（见《历史人物》）超越历史，去苛求古人，似乎也不太恰当和公允。

三国时期，由于曹操的提倡和培育，出现了文学上“俊才云蒸”的时代，曹植则是这时期文学上的峨峰绝顶。他没侵害过任何人，他同情人民的疾苦，有为国建功立业的理想，想往自由，力争解放，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在曹丕父子的残酷迫害下，报国无路，才智不能发挥。在四十一岁的壮年，悲惨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人民热爱这位诗人，同情这位被压迫者，体现了中华民族心地善良的美德。

曹植是个封建王侯，他没有把自己葬于当时皇族安葬的邙都，而遗令薄葬鱼山。他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把自己视作人民的一员。要说他后半生有所前进的话，在十一年的封建迫害中，他认清了“孝悌忠信”纱幕后的罪恶，他厌恶了贵族生活，渴望能成为平民百姓。“愿为中林草，

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荑连”（吁嗟篇，封东阿王后作）。晚年的曹植，生活越来越清苦，文风愈来愈深沉，一反他少年时候的放荡作风，写了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如“太山梁甫吟”等，深得人民喜爱。任何人都有个少年时期，特别对于贵族出身的曹植的早期生活作风，是可以谅解的。何况他后来也作了改正。这是我们应恰当对待的。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初稿

东阿历届县委名单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36年	书 记	苏 民
至	组织委员	王玉珍
1937年	宣传委员	何有信
	军事委员	新 斧
	民运委员	陈兰怀
1938年	书 记	苏 民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组织部长	刘洪亚
	宣传部长	秦延宾
	保卫部长	孙梅亭

注：1938年秋苏民去南宫学习时，位子方代理。

1939年	书 记	秦延宾
	组织部长	赵振清
	宣传部长	张少溪
	民运部长	陈兰怀
1940年	书 记	苏 民
	组织部长	秦延宾
	宣传部长	张少溪
	民运部长	韩雁北
1941年	书 记	赵振清
	组织部长	韩雁北
	副 部 长	彦 华
	宣传部长	张少溪
	副 部 长	雷 震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民运部长	陈兰怀
1942年	书 记	秦延宾
	组织部长	韩雁北
	宣传部长	张少溪
	民运部长	陈兰怀
1943年	书 记	秦延宾
	组织部长	杨 森(曾兼四区书记)
	宣传部长	张少溪
1944年	书 记	董志刚
	组织部长	秦延宾
	宣传部长	姚传德
1945年	书 记	李学之
	组织部长	杨 森
	宣传部长	
1946年	书 记	秦延宾
	组织部长	
	宣传部长	
1947年	书 记	秦延宾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组织部长	高 平
	宣传部长	王 远
1948年	书 记	秦延宾
6月前	组织部长	刘泽民
6月后	书 记	宋 云
1949年	书 记	宋 云
	组织部长	葛道峰
1950年	书 记	宋 云
	组织部长	张××
	宣传部长	秦进斋
	农业部长	魏子方
	秘 书 长	田剑秋
1951年	书 记	宋 云
	组织部长	段俊卿
1952年	书 记	宋 云
6月前	组织部长	雷庆言
6月后	书 记	贾 涛
	组织部长	耿善亭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53年	书 记	贾 涛
	副 书 记	秦广臣
	组织部长	耿善亭
	宣传部长	秦广臣 (兼)
1954年	书 记	贾 涛
	组织部长	张允岱
	宣传部长	王晓峰
1955年	书 记	贾 涛
	组织部长	张允岱
	宣传部长	王晓峰
1956年	书 记	贾 涛
	副 书 记	杨培贞
	组织部长	张允岱
	宣传部长	王晓峰
1957年	书 记	贾 涛
	副 书 记	杨培贞
	组织部长	张允岱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宣传部长	王晓峰
1958年	书 记	贾 涛
	组织部副部长	孙长华

1958年12月至1961年12月东阿取消，并入茌平与寿张二县。

1961年12

月10日	书 记	姚俊峰
	组织部长	刘道远
	宣传部长	张玉宾
	副 部 长	赵有木、孙方涛
	农村工作部长	杨之洞
	副 部 长	高明远、苏景云
	办公室主任	宓伍珍

1962年	书 记	姚俊峰
	副 书 记	杨培贞、王吾之
		刘玉奇
	组织部长	刘道源
	宣传部长	张玉宾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63年	统战部副部长	王春亭
	办公室主任	宓伍珍
	副 主 任	苏景云、艾 蕴
	书 记	姚俊峰
	副 书 记	杨培贞、王吾之
		刘玉奇
	监委书记	杜祥清
	副 书 记	叶成太、张景奇
	组织部长	刘道源
	副 部 长	吕滨和
	宣传部长	张玉宾
	副 部 长	赵有木
	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孙长华
	统战部副部长	王春亭
	机关党委书记	贾生全
	力公室主任	宓伍珍
	副 主 任	侯士孝、艾 蕴
		苏景云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64年	书 记	姚俊峰	
	副 书 记	王吾之、刘玉奇	
		杜祥清	
	组织部长	刘道源	
	副组织部长	吕宾和	
	宣传部副部长	赵有木、孙方涛	
	办公室主任	宓伍珍	
	副 主 任	候士孝、苏景云	
	1965年	书 记	姚俊峰
		副 书 记	王吾之、刘玉奇
		杜传均	
组织部长		赵文德	
副 部 长		董喜雪	
宣传部长		柴树轩	
副 部 长		赵有木、孙方涛	
农村工作部长		王胜林	
办公室主任		宓伍珍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66年		
4.27前	书 记	姚俊峰
	副 书 记	同65年 宓伍珍
4.27后	书 记	王吾之
	副 书 记	刘玉奇、杜传均
		宓伍珍
	组织部长	赵文德
	副 部 长	董喜雪
	宣传部长	孙方涛
	副 部 长	柴树轩
	办公室主任	孙长华
	副 主 任	张子奎

1966年6月16日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组 长	王吾之
副 组 长	刘玉奇、赵文德
办公室主任	陈永善、孙方涛
1911年	1966年

东阿县政府主要人员一览

1	2	3	4
国	日	抗	建
民	伪	日	国
党	时	时	后
时	期	期	时
期			期

(一) 辛亥革命————1939年

东阿县政府官佐人员一览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籍 贯	简 历
1911年	县 长	宋世男	陕西凤翔府	监 生
1912年	县 长	李树庭	山东宁海县	廩 生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13年	县 长	邢之襄	直隶南宮县 日本东京 帝国大学 毕业
1914年	(继任)		
1915年	县 长	宋世男	
	至		
1917年	警备队长	王金奎	
1918年	县 长	方家永	安徽桐城县 庚子、辛丑 并科举人
	至		
1921年			
	警备队长	王金奎	
	保卫团正	张允符	
1922年	县 长	刘风岗	直隶河间县 附贡生
1924年	县 长	赵树南	京兆宛平县 北洋警务 学堂毕业
	至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26年			
1927年	县 长	于 璜	江苏太兴县 附贡生
	县 长	马懋庭	河南西华县 唐山大学 毕业
	县 长	吴夺标	安徽蒙城县 法政专科 毕业
	县 长	吴奉章	(十二月代理)
1928年	县 长	程 立	安徽黟县 东京警察 学校毕业
	县 长	畅联晋	山西万泉县 山西大学 毕业
1929年	县 长	屈甲三	山西万泉县 国立大学 毕业
	县 长	朱光明	河北沧县 北京警务 学校毕业
	县 长	林振福	(八月间代理)
	县 长	周竹生	山东莒县 国立法政 大学毕业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30年	县 长	周竹生
1933年	县 长	庄守忠、江苏武进县
至		

1938年

(二) 日伪时期

1939年	县 长	张勉之 (日伪政府)
	大 队 副	张泗春 (上尉)

(三) 1940年1月1日抗日政府成立

县 长	王西成 (因病由苏民代理)
-----	---------------

县 长	苏 民
-----	-----

县大队长	苏 民
------	-----

(由县长兼)

副大队长	冯兰亭
------	-----

财政科长	岳克寒
------	-----

民政科长	李华斋
------	-----

妇救会长	王 之
------	-----

农救会长	于耀三
------	-----

青救会长	谭成兴
------	-----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行政改九个分区：

一分区区长	杨培宽
二分区区长	刚 标
三分区区长	邢子厚
四分区区长	杨兰坡
五分区区长	史 光
六分区区长	雷 震
七分区区长	
八分区区长	焦书亭
九分区区长	谭光堂

注：原区划四个区，变更为九个分区。

1941年	县 长	苏 民
	大 队 副	梁仁奎
1942年	县 长	苏 民
	大 队 副	王子奎
	公安局长	李建民
	独立营营长	新 斧（即谭波）
1943年	县 长	谷 泉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大 队 副	李国均
九个分区合并划为六个分区：		
	一 区 书 记	芦 光
	区 长	谭其山
	二 区 书 记	张绪青
	区 长	付振鲁
	三 区 书 记	李玉铭
	区 长	李杰三
	四 区 书 记	杨 森
	区 长	王中范
	五 区 书 记	李长青
	区 长	李长青 (兼)
	六 区 书 记	崔杰民
	区 长	赵 凯
1944年	县 长	谷 泉
	抗联主任	张明春
1945年	县 长	谷 泉
	抗联主任	张风春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46年	县 长	耿宗周
	抗联主任	李光明
1947年	县 长	李长清
1948年	县 长	李长清
	副 县 长	王筱湖
1949年	县 长	李长清
	副 县 长	程 光
1950年	县 长	武建民
	副 县 长	程 光
1951年	县 长	王省三
	副 县 长	刘 勒
1952年	县 长	王省三
	副 县 长	李公堂
1953年	县 长	马兴民
	副 县 长	武仲景
1954年	县 长	马兴民
	副 县 长	武仲景
1955年	县 长	李书亭

时 间 职 务 姓 名

1956年

至

1958年 县 长 魏公相

1958年12月至1961年12月东阿撤消，并入茌平、寿张。

1962年 县 长 王保亭

副 县 长 翟继尧、张少严

武仲景

1963年 县 长 王保亭

副 县 长 张风同、翟继尧

张少严、武仲景

1964年 县 长 王保亭

副 县 长 张风同、翟继尧

武仲景、张少严

至

1966年6月16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东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5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